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笔谈

洪银兴 刘 伟 高培勇 金 碚  
闫 坤 高世楫 李佐军

---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在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实践中形成了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成果。本刊组织六篇文章，以笔谈的方式从不同视角学习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南京大学教授洪银兴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化，需要从基本立场和时代特征出发，在经济发展、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予以阐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伟着重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讨论习近平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培勇从分析视角、发展理念、政策主线、实施机制和政府作用五个方面，总结五年多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与实践发生的深刻变化，认为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导下，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已初步确立。为了更好地把握习近平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首席教授金碚从五个方面探讨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新思维，包括经济行为和发展动能、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的关系、经济主体及主体需要、结构性和精准性的方法论以及新发展理念的策略法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闫坤探讨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渊源及其时代意义，分析关于乡村振兴战略新理念主要创新与实践路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高世楫和李佐军，从时代性、制度保障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讨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我们期待通过总结新时代中国历史性变革不断深入的实践经验，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的学术化学理化。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洪 银 兴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马克思创立时就被赋予了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新时代，同样赋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时代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式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传统教科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翻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它的最新成果集中体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成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学理化，本文从基本立场和时代特征出发，在经济发展、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三个层面予以阐述。

##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和时代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sup>①</sup>这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前者涉及基本立场，后者涉及时代特征。

基本立场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政治经济学因涉及经济利益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马克思说，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派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中的三十八个信条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sup>②</sup>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其阶级性表现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彻底批判，公开主张和维护无产阶级利益，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服务。《共产党宣言》指

<sup>①</sup>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sup>②</sup>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①</sup> 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人，“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sup>②</sup>

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sup>③</sup>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sup>④</sup> 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近一个世纪中砥砺前行的艰难历史，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sup>⑤</sup> 中国共产党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外部条件大变动等执政环境复杂性的长期考验，“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sup>⑥</sup>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一生命线，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

基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社会主义本质贯穿新时代特征。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就指出，共同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并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经过40年的实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4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21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12页。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1页。

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61、67页。

社会主义中国富起来了。但也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等人民很不满意的大问题。针对这些新矛盾新挑战，习近平强调，“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sup>①</sup>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关注的，不是一部分人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逐步实现，要求全党“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sup>②</sup> 坚决打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尤其是扶贫攻坚战和环境污染攻坚战，让人民群众在民生改善中有更多的获得感，使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新时代习近平关于加快落实社会主义本质规定的基本方略，是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思想。

第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sup>③</sup> 正确识别和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直接制约着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期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主要基于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使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告别低收入阶段，进入了中等收入阶段。面对这种新变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适时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涉及物质生活，还涉及政治、社会、生态和文化等方面。突出表现是人民消费水平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后，进入中高端消费阶段，消费需求包括生活质量、安全、卫生、健康等层次。习近平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更关注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为主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着力点，是解决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问题。不充分发展最为突出的是由创新能力不足产生的核心技术供给不充分，由供给体系质量不高产生的有效供给不足等问题。解决不平衡发展主要是补短板，补农业现代化的短板、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短板、生态环境污染的短板。协调发展就是要补齐短板。反映新时代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分析作为出发点和主线。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83页。

② 《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意识 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精神》，《人民日报》2018年7月7日，第1版。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11页。

第三,新时代发展目标的特征。党的十九大绘制了新时代发展总任务的蓝图,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第一个奋斗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奋斗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一个1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是要使人民生活更为宽裕;第二个15年全面现代化的实现,将使人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康,这是以人民生活水准为标准的发展进程。共同富裕也是分两步走。前者要求,“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后者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sup>①</sup>现代化问题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发展的研究任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共同富裕逐步实现的过程。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也是推动中国进入强起来时代的重要标志。

## 二、新时代经济发展层面的重大理论创新

新时代的经济发展成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共产党宣言》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任务:“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sup>②</sup>研究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发展中大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进入新时代,面临着一系列与低收入阶段不同的新的重大发展问题。一是传统发展动力衰减、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极限,长期保持的经济高速增长不可持续。二是世界上一些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没有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环境生态破坏等严重问题,发展陷入停滞。我国面临着避免重蹈他人覆辙、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三是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需要由数量转向质量,经济发展的不充分不平衡凸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解决这些经济新常态下的重大发展问题指明了方向。习近平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sup>③</sup>为把握经济新常态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将其明确为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目标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习近平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28、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73页。

指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sup>①</sup>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经济规律的科学,对转向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研究,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习近平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不仅是对我国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指引,而且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一系列创新。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驱动力也不同。在低收入条件下,最初阶段为要素驱动,主要依靠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推动经济增长。第二阶段为投资驱动,靠持续的高投资(以低消费为条件)推动经济增长和起飞。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发展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支持物质资源高投入的要素供给已至或接近极限,居民也不愿以低收入和低消费水平为代价支持高投资。向高收入阶段过渡,创新须成为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核心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着力点是国际前沿核心技术。针对“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创造新产业、引领未来发展的科技储备远远不够,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这一现状,<sup>②</sup>习近平强调,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sup>③</sup>这既需要基础研究以研发核心高新技术为导向,也需要推动占领产业制高点的产业创新。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解决好从“科学”到“技术”的转化,建立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机制和通道。为此“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作用,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创新主体作用,形成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体制。”<sup>④</sup>这就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加强对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

协调是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发展中国家通常采取不平衡发展战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如我国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sup>⑤</sup>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运用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化生产,可以归结为协调发展理论,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协调成为发展目标意味着,经济发展的目的不再是经济增长在数量上的累积,而是追求经济、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20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第203页。

③ 《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人民日报》2018年7月14日,第1版。

④ 《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为我国发展提供有力科技保障》,《人民日报》2018年7月14日,第1版。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5—36页。

社会、人与自然等多个方面的平衡发展。协调成为发展手段意味着，注重发展的平衡性、系统性与可持续性，协调能够促进国家实现更高层次的发展，提高发展的整体水平。协调成为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意味着，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标准，涉及产业、城乡、区域等在结构上的平衡发展。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生活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习近平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财富观，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不能为谋求物质财富而牺牲生态财富。习近平指出，“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sup>①</sup>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工业文明时代人类利用工业化的文明成果，对大自然的索取和掠夺，已造成自然界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新时代，也是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的时代。绿色发展的理念包含财富观的创新。干净的水、清新的空气、多样性的生物、绿色的环境是宝贵的生态财富。经济发展不仅要谋求物质财富，还要谋求生态财富。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对政治经济学来说，涉及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指导开放的经济理论，突出利用国际国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即使在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开放仍然获得了全球化的红利。现在的开放型经济也进入了新时代。与超级大国推行反全球化的政策相反，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扛起了继续推动全球化的大旗。遵循习近平关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新时代中国要建立以下高质量的开放型经济体系。（1）与过去重在引进不同，开放战略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利用自由贸易区等开放载体，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2）服从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进国外要素的着力点将转向创新要素，实行开放式创新。（3）与过去以资源禀赋比较优势被嵌入全球化不同，参与全球化分工将从比较优势转向竞争优势，着力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新优势。（4）与过去以禀赋的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不同，重视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争取在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争取依托核心技术建立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融资、生产、服务的价值链，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5）从过去偏重制造业对外开放，转向涵盖各个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全方位开放，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市场化的推进，亚投行等金融机构作用的增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就有了金融支撑。（6）与过去基于沿海地区，面向海洋、面向发达国家不同，现在需要在提升向东开放的同时，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加快向西开放步伐，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页。

推动内陆沿边地区成为开放前沿。与此同时，习近平警示，面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规则”的“重大调整”，“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压力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sup>①</sup>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涉及共同富裕理论的创新。在马克思预见的未来社会中，“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sup>②</sup>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存在的平均主义，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开创了经由先富后富差别，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继承邓小平的遗愿，习近平进而提出，“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是我们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这方面问题解决了，全体人民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能充分调动起来，国家发展也才能具有最深厚的伟力。我国经济发展的‘蛋糕’不断做大，但分配不公问题比较突出，收入差距、城乡区域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sup>③</sup>全民共享是目标，全面共享是内容，共建共享是基础，渐进共享是途径。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体系。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新发展理念不仅是指引中国走向富强的行动纲领，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理论之魂。

### 三、新时代经济制度层面的重大理论创新

社会经济制度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中国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就是从市场化改革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制度理论创新也是由市场化改革推动的。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推动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以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基本分配制度的形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涵的新界定，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贡献，引领了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创新。

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界定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0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25页。

市场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界定有两个突破性进展。第一，回归到市场经济的本义，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由“基础性”改为“决定性”。习近平指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sup>①</sup> 市场的自主性表现为市场调节信号（市场价格自主地在市场上形成），引导资源的合理配置。政府因此在实践中大力度推进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的改革。第二，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一个整体，“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sup>②</sup> 党的十九大就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的部署，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重点。一是完善产权制度，二是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目标是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环境。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突破，必然牵动经济体制其他方面的深化改革。在习近平相关表述中，只有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用“基本”两字。这两个基本制度的理论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制度领域的核心内容。

生产资料所有制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永恒的主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其发展的新时代，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的理论概括——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在理论创新境界上有三个方面的政策。一是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二是明确多种所有制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既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又鼓励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发展。三是在国有企业总体已与市场经济融合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其路径包括：国有企业按商业类和公益类两类进行分类改革；国资管理转向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产品分配和消费水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基本分配制度。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都提出，确立和健全劳动、资本、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52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53页。

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进入新时代后，习近平坚持和完善基本分配制度的基本思路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既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又要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1)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各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由各自的生产要素市场决定。这意味着，各种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份额，不只取决于各自的投入，还要取决于各自的“贡献”和供求状况。这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现实体现。在各种非劳动要素参与收入分配的背景下，不同人群拥有的要素存在很大差别，不可避免会产生收入差距，而生产一线劳动者报酬所占的收入比重会下降。(2)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因而明确提出，收入分配要体现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就要求科学认识按劳分配为主体分配的内涵和外延。不仅公有制企业中要坚持按劳分配，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报酬也应体现按劳分配的要求。而且对属于总体劳动中的技术和管理劳动实行按劳分配，作为复杂劳动，这部分劳动者的收入也较高。这些复杂劳动群体与生产一线直接劳动者的收入合起来，体现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同时，对直接劳动者提供教育培训，增加其技术等要素的供给，不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从公平正义要求出发，提高生产一线直接劳动者的收入，主要路径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还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体拥有财产性收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以上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引领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基本分配制度理论政策创新境界，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 四、新时代经济运行层面的重大理论创新

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运行的研究，聚焦资源配置方式和供求关系的分析，关注的是经济运行效率和供求平衡，涉及经济运行的主体、环境及调节。习近平指出，“供给和需求是市场经济内在关系的两个基本方面，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二者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管理和调控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性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事关长期发展的“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注重激发经济增长动力”。<sup>①</sup>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经济运行层面的理论政策创新，包括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个方面，主要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些既涉及运行问题，又涉及发展问题，下面只论述其推动的经济运行理论和政策的创新。

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始于需求侧的市场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关于市场调节及其带动的供求机制的分析，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99页。

成为经济运行分析的主要内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需求侧经济运行理论和政策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创新境界。其一，在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取决于市场环境，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以及法治化营商环境。其二，明确提出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需求管理，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突出扩大消费需求的重要地位，推动了政治经济学对消费需求的研究；宏观调控也集中在利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内需的总量需求调控。

然而面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下行日益增大的压力，只是在需求侧进行改革，只是完善需求管理，不能有效解决经济运行的效率和供给质量，不能以可持续健康发展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日益增长，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5年11月，习近平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sup>①</sup>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研究，为经济运行分析开拓了新境界。

一是供给侧运行的目标。全要素生产率最早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索罗提出的，系指各种要素集合所产生的生产率之和，大于各单个要素投入的生产率之和。习近平在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讲话中，多次使用这个概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sup>②</sup>将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供给侧运行的目标，实际上明确了资源配置效率的评价标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增加供给侧的要素投入，而习近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为关注技术、结构、效率、制度等方面的投入。他要求“优化现有生产要素配置和组合，提高生产要素利用水平，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断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sup>③</sup>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成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途径。

二是供给侧的调节方式。供求实现动态平衡的关键，在于供给侧体系的建设。现有供求关系的结构性矛盾集中在供给侧。产品的质量、技术档次、卫生安全等性能，不适合市场需求，形成有效供给的短缺，又与无效和低端的产能过剩并存。如习近平所说，“我国供给体系产能十分强大，但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sup>④</sup>面对这种因供给结构造成的供求不均衡，根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经济结构调整须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进行去产能、去库存等方面的存量结构调整，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8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98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08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3页。

为有效供给腾出空间。这种调节方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的经济新常态。

三是金融创新。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去杠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经济运行理论政策创新，有两个方面的重要体现。一是针对“脱实向虚”，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二是针对企业的“高杠杆”和由此产生的高利息负担，改革投融资体制，使企业投融资结构更多地由银行的间接融资，转向直接融资如股权融资，从而在投融资体制结构上建立企业自我积累自我约束的机制。发展多层次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为企业参与资本市场运行提供更多工具。

四是供给侧的激励制度。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需求侧改革突出市场选择；而供给侧改革突出的则是经济激励，增强发展动力。尤其注重对实体经济的激励，突出对市场主体的激励。为企业降低税、费、利息和社会负担，使企业轻装上阵。保护和激励企业家精神，保护企业财产，目的是释放企业活力。

从经济体制改革角度分别研究需求侧和供给侧的运行，反映中国探索经济运行理论政策的不断深入，将其成果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也应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建设的重要任务。

以上整体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的基本构想，包括基本理论和重要范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使命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魂，在实践深化和理论总结的不断进步中，构建学理化的经济学术体系，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责任编辑：梁 华 责任编审：许建康〕

## 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sup>\*</sup>

刘 伟

2018 年 6 月,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 “当前, 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特别是, “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 是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重大意义。”<sup>①</sup>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具有新时代的历史特征和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新发展理念, 指出了我国社会经济到 21 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本文从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方面,<sup>②</sup> 讨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

### 一、历史逻辑: 发展主题的新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努力, 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 推翻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制度, 新中国的建立实现了从封建专制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 在此基础上, 通过社会主义革命, 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时期, 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 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在 21 世纪中国的强大生命活力。中

\* 本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读本编写” (2016MZD001) 阶段性成果, 第一首席专家为刘伟。

① 《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4 日, 第 1 版。

② 参见刘伟的《GDP 与发展观——从改革开放以来对 GDP 的认识看发展观的变化》(《经济科学》2018 年第 2 期)、《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结合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研究》2016 年第 5 期)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经济研究》2018 年第 5 期), 本文在上述成果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梳理和深化。

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发展，创造性地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强国的新途径。

###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sup>①</sup> 战后许多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面临如何摆脱贫困的急切历史任务，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主题，但其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却成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专利，“给土人提建议”成为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流。<sup>②</sup> 然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出的“药方”并不灵验，就绝对水平看，相当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不仅未能据此有效地摆脱贫困，反而长期滞留于恶性循环的“贫困陷阱”（马尔萨斯陷阱）中。<sup>③</sup> 就相对水平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仅未能缩小，反而在不断扩大。<sup>④</sup>

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实践，成功推动世界上人口及贫困人口规模巨大的中国跨越了“贫困陷阱”。在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站起来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我国基本实现了小康社会，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一是经济总量规模空前。2017年底，中国GDP超过82.7万亿元人民币（约12万亿美元），从1978年占世界GDP总量的1.8%上升至2017年的约15%，<sup>⑤</sup> 从1978年相当于美国GDP的6.3%上升至2017年的约63%，<sup>⑥</sup> 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sup>⑦</sup> 二是人均收入水平进入新阶段。人均国民收入（GNI）从1978年的316元（按当年汇率计算约合250美元），<sup>⑧</sup> 上升至2017年的59660元（按汇率计算

- 
-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4页。
- ② 参见贾·N·巴格瓦蒂：《对劳尔·普雷维什发展思路的评论》，杰拉尔德·M·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谭崇台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页。
- ③ “贫困陷阱”（马尔萨斯陷阱）系指贫困的累积性效应（马太效应）。参见R·讷克斯：《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谨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6页。
- ④ 参见林毅夫：《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 ⑤ 参见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18年3月23日，第1版。
- ⑥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World Bank Database）的数据计算。
- ⑦ 参见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aining Momentum?*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pril 2017.
- ⑧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81年，第5页。

约合8827美元)。<sup>①</sup>人均GDP由发展初期的低收入阶段贫困状态,上升至下中等收入阶段的温饱水平(1998年),再至超越温饱水平的上中等收入阶段(2010年),从216个国家(地区)世界排名的末端上升为第95位左右。<sup>②</sup>三是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演进。在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基础上,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从改革开放初期的70%以上下降至28%以下,工业化水平显著提升,第三产业迅速成长,经济结构开始呈现工业化后期的征兆,相应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城乡结构发生了深刻改变,城市化率从1978年的17%左右上升至2017年的58.5%。<sup>③</sup>社会经济的这些迅速发展,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本动因。

## (二) 经济条件的系统性变化

进入新时代,约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条件必然发生系统性的深刻变化。习近平全面论述了这种变化,进而明确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具有新的时代性特征。归结起来看,一方面,供给侧原有的比较竞争优势——要素成本低(包括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技术进步等成本),已发生了根本性逆转,需要培育新优势;另一方面,需求侧原有的广阔增长市场空间,即长期经济短缺(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等),也发生了超越温饱、寻求美好生活的方向性转变。这些约束条件的变化,推动着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进而形成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要求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必须首先树立新的发展理念,调整以往以GDP增长为核心引领指标的指导思想。以这样的指标体系制定发展规划,在克服贫困的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尤其对于跨越“贫困陷阱”。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总设计师邓小平极富远见地提出,以GDP指标为标志实现“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人均GDP水平实现翻一番,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实现初步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赶上中等发达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sup>④</sup>跨越“贫困陷阱”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新的挑战,以GDP为核心指标的粗放型发展战略凸显了它的局限性。(1) GDP体系注重的是数量增长,忽视结构升级即质态转变演化。(2) GDP核算以一年之内经济活动的流量为基础,可能忽视资本和财富的存量

① 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2月28日,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802/t20180228_1585631.html), 2018年3月5日。

② 按世界银行2016年的排序,我国人均GDP为8250美元(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18年中国预期人均国民收入达10088美元,列191个排名国家中的第72位(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Gaining Momentum?*)。

③ 参见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二〇一八年三月五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人民日报》2018年3月23日,第1版。

④ 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1页。

即长期国力的积累。(3) GDP 体系以市场交易机制为基础,可能忽视市场失灵及市场之外的其他社会发展领域,产生严重的发展“短板”。(4) GDP 核算体系难以把环境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忽略绿色生态成本。因此,不能再以 GDP 论英雄,为反映新时代历史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进而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理念的新发展指导思想。

### (三) 经济发展新特点

“时代是出卷人”,进入新时代,发展主题的历史内涵、约束条件、发展方式和政策及制度安排等均发生着深刻变化。在深入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和原理,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时代变化的历史需要,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1)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克服贫困现象、实现富起来阶段进入强起来阶段,必须树立新的发展理念。(2) 约束经济增长的条件发生了系统性变化,必须根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投入量扩张为主拉动规模扩张的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的调结构发展。(3) 中国必须面对挑战和机遇的历史性变化:距离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从来没有如此之近;面临的风险和矛盾则比以往更为复杂。要求加快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4) 宏观经济失衡具有结构性特征,从以往单一总量方向性失衡,演变为总量和结构失衡并存,面临“双重风险”,<sup>①</sup>要求根本改变宏观调控机制,特别是在兼顾需求管理的同时,突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5) 世界经济格局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起了深刻变化,“修昔底德陷阱”的作用很可能产生影响,必须构建新的内外联动的开放格局。(6) 最为重要的是,必须确立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包括构建新的产业体系,培育更具竞争性的资源配置机制等。

## 二、理论逻辑:构建新的发展理论

理论须呼应历史,思想须回应时代。经济理论创新要适应经济发展历史实践的要求,必须在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并联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的运动过程中,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讨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以及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变革,明确经济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和历史观,聚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发展的突出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基本原则和根本途径。

<sup>①</sup> 双重风险系指成本推动的潜在通胀压力和需求疲软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

改革开放初期,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时,邓小平就敏锐地提出,这个决定“写出了—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sup>①</sup>理论发展从“政治经济学初稿”到习近平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历史任务,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历史实践作出的科学认识,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对理论指导的深刻要求,需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现富起来并走向强起来的时代经验进行总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便是新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结晶。

### (—) 方法论和历史观

要以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具有决定作用的基本原理,作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问题。这一原理是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根本依据。—方面在理论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只能在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认识生产力发展的根本要求,并以此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进而反过来推动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习近平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sup>②</sup>这也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基本方法、根本目标、价值取向的集中概括。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的根本检验,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更为重要的是,人民群众是生产力发展的主体,离开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则一事无成。

### (二) 世界性难题

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分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其突出的问题和难点在于,如何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如何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在社会制度上将其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重要的体制机制保障。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实践的突出特征在于,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竞争性的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机制有机地统一起来,其经济运行的关键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

<sup>②</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页。

又在于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sup>①</sup>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我们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在实践中破解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sup>②</sup>这一所有制性质与运行体制的有机结合，至少涉及两个层次的基本理论问题。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如何与商品货币的市场经济关系实现内在的统一。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如何实现政府调节与市场调节的有机协调。在经济思想史上，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根本否定上述二者统一的可能性，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逻辑上也质疑二者的兼容性。苏东剧变最终以放弃公有制、实现私有化和市场自由化为归宿，以实施“华盛顿共识”告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特点之一，便是在背离这种所谓“共识”的基础上，对这道世界性难题的不断破解。

### （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到 21 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先需要完成从中等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的跨越，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现阶段中国现代化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从人类现代化发展史看，世界上高收入国家或地区（70 个左右）从上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阶段，总体上平均经历 12—13 年，其中人口大国或地区（20 个人口过千万的国家或地区）平均经历 11—12 年，而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计，实现跨越的只有约 13 个；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或者仍处于贫困阶段（现阶段约 36 个国家仍处于低收入阶段，人均 GNI 在 1005 美元以下），或者虽然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现阶段下中等收入国家 54 个，人均 GNI 在 3955 美元以下；上中等收入国家 54 个，人均 GNI 在 12235 美元以下，12236 美元高收入标准相当于 1987 年的 6000 美元，此为工业化标准），但长期难以实现跨越，被称为

<sup>①</sup> 参见刘伟：《中国经济改革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性难题的突破》，《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5 期。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 63—64、64 页。

“中等收入陷阱”。<sup>①</sup> 20世纪70年代拉美多国形成的“拉美漩涡”表明，这些国家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已近半个世纪，但因经济长期停滞和连续遭遇危机，至今未能迈入高收入阶段。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尼等国，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迄今有30多年，也未能实现向高收入阶段的发展，还引爆了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即所谓“东亚泡沫”。地处中东的西亚北非许多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阶段已20多年，但因局势动荡战乱不断，未能迈入高收入阶段，即所谓“西亚北非危机”。

#### （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什么，为谁发展；怎样才能最充分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的动力何在；这是同一问题的两个基本方面。必须把处理好各方面利益格局的矛盾关系，进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根本原则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人民创造历史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思想。习近平指出，“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我们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打赢脱贫攻坚战，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sup>②</sup> 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习近平新发展理念中的“共享”理念，是对先富起来发展阶段论和共同富裕不断发展论的统一，从根本上阐明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工作的目的、动力和主体，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原则的进一步阐释。

### 三、实践逻辑：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

用科学的经济发展理论指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首先需要根据新时代发展要求的历史变化，明确新的总体布局，总结发展目标和新发展的历史内涵，进而确立新的发展理念，作为实现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在新发展理念的总引领下，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新时代现代化经济体系，以此为基本方略，实施一系列战略布局、政策举措和制度创新。这些实践逻辑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

<sup>①</sup> 参见 The World Bank, “World Bank GNI per Capita Operational Guidelines & Analytical Classifications,” <http://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DATASTATISTICS/Resources/OGHIST.xls>, World Bank Database, 2017, 2018年5月10日。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41、46页。

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创新中。

### （一）经验教训

习近平指出，“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不是凭空得来的，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也是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sup>①</sup> 这些新问题如上所述，包括上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约束基本条件发生了系统性变化，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攻坚战紧迫性、更复杂的国际条件等，因而要求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实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确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纲领性新发展思路及其着力点的指导地位。

### （二）现代化经济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sup>②</sup> 习近平进一步概括了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主要包括的七个方面：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同互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针对这七个方面，他还强调指出，“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sup>③</sup>

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克服经济发展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使供给体系有效适应需求结构变化，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实现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的跃升，核心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sup>④</sup> 这是解决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主要方面问题的重大战略调整，聚焦于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当前我国市场运行中的“三大失衡”——实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21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30页。

③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年2月1日，第1版。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08页。

体经济内部供需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与金融部门的失衡，房地产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失衡，均属于供给侧结构性失衡。宏观经济“双重风险”的并存，其深层原因也主要在于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风险之一，潜在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压力，为供给侧要素成本上升与效率提高之间的结构失衡所致。风险之二，经济下行条件下需求拉动疲软、投资需求增速下滑，其深层动因是供给侧创新力不够、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缺乏有效投资机会，不是资本货币和商品的供应量不足。其中的消费需求增速下滑，根本原因在于供给侧产出质量和结构不合理，以及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扭曲，不是国民收入及相应居民总体购买力的增速不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出发点针对生产者，包括劳动者、企业、产业，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而不是像需求管理那样针对消费者。前者落脚点在于国民经济的结构效应，包括组织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利益分配结构等，目的是结构升级和优化，而不像需求管理那样体现为总量效应。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集中体现了上述攻关期的国民经济发展要求，是新时代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方略。

就本质特征而言，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西方的“供给革命”有重大区别。一方面，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层次低，结构性失衡严重，结构转型升级压力大，与发达国家经济相比具有发展阶段的差异。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根本对立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而不是满足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因而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竞争机制之间在经济制度和运行机制上，有可能实现有机统一，而不是根本对立。遵循习近平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突出抓好以下战略层面的工作。<sup>①</sup>（1）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先进的制造业和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筑牢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产业基础。（2）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3）积极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布局。（4）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5）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制度创新不断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制度保障。就政策贯彻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现阶段需要深入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以提升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市场竞争力。

### （三）稳中求进

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习近平指出，“‘稳的重点要放在稳住经济运行上，确保增长、就业、物价不出现大的波动，确保金融不出现区域性系统性风险。‘进的重点要放在

<sup>①</sup> 参见《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年2月1日，第1版。

调整经济结构和深化改革开放上，确保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驱动发展取得新成效。”<sup>①</sup>“稳中求进”是统一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总量调控与结构改革、短期增长与长期发展关系的行动步调。

“稳”的重点是均衡增长，需求管理重在解决总量增长问题，需求管理若失控，或出现需求膨胀，通货膨胀压力上升，则不具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市场压力和动力；若需求严重疲软，失业率攀升，则不具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经济空间和可能性。协调统一需求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系，要求协调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菲利普斯曲线）、经济增长率与失业率（奥肯定律）等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关系。没有“稳”就难以有“进”，“稳”的根本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总量均衡。

“进”的重点指向以深化改革推动结构转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提高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解决结构性问题，没有“进”便不可能有长期的“稳”。“进”最重要的是制度创新。实践新发展理念需要制度创新，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需要不断变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求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这就要求展开全面的经济、政治、法治、文化等多方面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变革。

不少国家之所以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无力实现持续发展，有诸多制度原因。（1）经济体制现代意义上的市场化进程滞后，政府与市场关系未能有机协调，导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2）法治化滞后，导致市场主体“私权”缺乏保护，政府主体“公权”缺乏规范。（3）政治制度的现代化滞后，国家治理机制和能力不完善，对政府权力缺乏约束，“寻租”行为盛行以致支配资源配置，道德文化上对“寻租”行为也缺乏约束，形成既无公平又无效率的局面。我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总结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从而为在新时代中国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奠定制度基础。

〔责任编辑：许建康〕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21页。

# 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高培勇

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进程，中国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呈现了一系列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既是客观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然，更是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物。正是立足于这些变化，我们才能成功驾驭中国经济发展大局，中国经济也才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始终保持持续健康发展的势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初步确立的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作出理论概括，将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实践提升至规律层面加以认识，从而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坚实基础，不仅是主动“对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迫切需要，而且是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工作者必须担当的历史责任。

## 一、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变化：一个基本脉络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源于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经济工作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高度概括。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就是宏观经济调控。以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主要线索，简要追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形成过程，进而梳理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与实践深刻变化的基本脉络，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2012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的十八大之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重要会议。面对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的转折性变化，怎么看待经济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世界经济已由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sup>①</sup>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判断，这次会议作出了两项重大政策调整。一是摒弃对于经济增长速度“快”的追求，不再使用“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平稳较快”、“又快又好”或“又好又快”等字眼，而是将经济工作目标聚

<sup>①</sup>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7日，第1版。

焦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sup>①</sup> 二是拓展宏观经济政策的反经济周期工具定位，不再局限于熨平经济周期，而是将“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两方面的功能，同时赋予宏观经济政策。以此为转折点，单纯抓引资、抓投资、抓项目、抓生产的做法得以纠偏，经济工作的立足点开始转向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sup>②</sup>

一年之后，于2013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作出了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以此为基础，党中央提出了全面认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生产总值增长二者关系的全新命题。不能把发展简单化为增加生产总值，要抓住机遇保持国内生产总值合理增长，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努力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而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要冷静扎实办好自己的事，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把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内需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sup>③</sup>

又是一年之后，在2014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三期叠加”被进一步高度概括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围绕经济发展新常态，这次会议分别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全面分析了中国经济发展所发生的趋势性变化。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发展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sup>④</sup>

在解决了“怎么看”的问题之后，“怎么干”的问题自然接踵而来。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在深刻认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的基础上，这一建议提出并形成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

①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温家宝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7日，第1版。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5页。

③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73页。

④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74—79页。

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sup>①</sup> 习近平将其视为“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世界经济复苏低迷开出的药方”。<sup>②</sup>

于是,2015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适时作出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建设的主攻方向和工作重点。会议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了“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五大结构性调整任务。<sup>③</sup> 作为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及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的重大创新,习近平特别指出,“党中央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基础上,对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的重大调整,是化解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困难和矛盾的重大举措,也是培育增长新动力、形成先发新优势、实现创新引领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选择”。<sup>④</sup>

2016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党的十八大以来宏观经济领域所取得的重要工作进展作了系统总结:作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形成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以及贯彻稳中求进总基调。<sup>⑤</sup>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本内涵,亦由此进一步明确为“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sup>⑥</sup> 与此同时,其重点任务也由“三去一降一补”扩展至农业、实体经济和房地产等领域。至此,从对变化了的经济形势怎么看,到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怎么干,再到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一个适应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初步形成。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全面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郑重宣布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勾画出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基本底色的基础上,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被锁定为跨越关口的迫切需求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围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分别从创新驱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等几个方面作出了战略部署。

2017年12月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的十九大后党中央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并形成的一系列经济工作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被高度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且,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9—2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3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98—101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07页。

⑤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1—113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5页。

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基本标志，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从将经济工作目标定位于“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到赋予宏观经济政策“逆周期调节和推动结构调整”双重功能；从作出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到全面分析中国经济发展所发生的趋势性变化，并将其进一步高度概括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从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到将着重点和着力点转到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上来，采取果断措施转方式调结构、化解产能过剩；从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到作出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决策，引导经济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从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掌握做好经济工作的科学方法，到形成以新的发展理念为指导、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政策框架，并最终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经济政策框架；从提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到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根本要求布局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这一系列有关宏观经济调控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构成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经济调控思想。

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在深刻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与实践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是“接中国地气”的，是有用、能用、管用的，实践也已证明是做对了的。它们不仅是5年来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结晶，而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必须长期坚持，不断丰富发展。

## 二、新时代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基本内容：基于总体层面的归纳

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形成进程如影随形，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与实践一系列深刻变化的结果，一个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已经初步确立。

不妨以“比对”这一既行之有效又事半功倍的方法，对其中的主要方面加以揭示和归纳，在“比对”中透过其间的变化，理解和把握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基本内容。

### （一）分析视角：由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到多因素交叉融合

对于经济形势的专业分析和精准判断，无疑是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前提，也是

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从总体上讲，以往我们对于经济形势的分析，是在传统宏观经济学的语境下展开的。根据传统宏观经济学的原理，经济形势的变化如同人的感冒发烧，总要周期性地出现于人的生命过程中。经济总是在周期性波动中前行，或是周期性下行，或是周期性过热。经济下行和过热的病因，又被归结于需求总量和供给总量的失衡。经济下行系总需求小于总供给所致；经济过热系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之结果。因此，每当遇有经济形势变化，我们在坚持抓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的同时，基本分析视角无非对准两个方面——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不是将其归结于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就是将其视作总量性因素作用的结果。按照周期性因素分析，下行的矛盾也好，过热的问题也罢，均属于“周期性”而非趋势性的，或者，均被认定为短期性而非长期性的。按照总量性因素分析，无论是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主要矛盾在于供求总量，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需求侧，均可通过加减需求总量办法得以缓解或解决。

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面对增速换挡、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的新形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趋势性变化，主要基于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的分析，不仅越来越凸显出它们的局限性，也越来越同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形相脱节。

习近平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sup>①</sup>“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sup>②</sup>

这显然是一个颇具创新意义的重要论断。

1. 既然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不是或不再是周期性和总量性因素，而系短期周期性波动因素和长期趋势性因素、总量性矛盾与结构性问题相交织，那么，经济形势的变化便不似感冒发烧般简单易辨，而可能是感冒发烧和心血管病类夹杂在一起，系急性病和慢性病相交织的复杂病。

2. 既然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的根源不是或不再是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而系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的经济循环不畅，那么，经济形势的变化便可能不仅是周期性而且是趋势性的，不仅是短期性而且是长期性的。或者说，可能是周期性变化和趋势性变化相叠加，短期性变化与长期性变化相交织。

3. 既然结构性问题最突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那么，供求总量便不是或不再是主要矛盾，需求侧便不是或不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加减需求总量已不是或不再是缓解或解决矛盾的有效办法。

这表明，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的经济形势分析，其视角的相应拓展势在必行。不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3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05页。

不仅要关注短期性经济波动，而且要引入长期性结构因素，将熨平需求侧的短期波动与解决供给侧的长期结构性问题巧妙结合。不仅要关注供求总量平衡，而且要追求供给结构的优化，将诊断和医治表现在总量失衡上的急性病，与以产业结构失衡、区域发展失衡等一系列重大结构性失衡为代表的慢性病紧密对接。

## （二）发展理念：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

对经济发展阶段的准确研判是做好经济工作的出发点，不同的发展阶段自然会形成不同的经济工作指导思想，即发展理念。作为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发展理念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

我们以往所秉持的发展理念，是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的语境下生成并与之相契合的。植根于高速增长阶段的特殊语境，经济工作的重心和聚焦点，自然会放在经济总量和增长速度上，也自然要围绕 GDP 的规模和速度转动。因此，GDP 增速的快与慢，往往被当作判断经济形势好坏和经济工作优劣的几乎唯一标尺。增速快了，就是形势好；增速慢了，就是形势不好。增速快一点，就是工作有成绩；增速慢一点，就是工作有问题。可以说，在 GDP 的规模和速度指标上做文章，以 GDP 论英雄，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普遍现象。

然而，面对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传统意义上且可能已经成为惯性思维的发展理念，不仅在经济运行层面，而且在政策考量层面，均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针对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任务、要求等方面的新变化，习近平要求，“经济工作的理念、思路、着力点等都要进行调整”。<sup>①</sup>“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sup>②</sup>

这一调整绝非限于字面意义，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

1. 既然经济发展的方向已经由粗放型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发展，那么，对于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评价，虽仍离不开 GDP 的增速，但 GDP 增速绝非唯一的标尺，亦非最重要的标尺。除此之外，质量和效益指标不仅要引入，而且要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成为整个经济评价体系的中心线索和核心内容。评估经济发展成效，不是看 GDP 增速有多快，而是看质量和效益有多好。

2. 既然目标在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那么，当下的经济发展虽仍不免于扩大总需求的操作，但只能是“适度”的。为短期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 112 页。

<sup>②</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21、35 页。

经济增长而实行“大水漫灌”的刺激政策、透支未来增长，已不是或不再是我们注重的选项。取而代之的，是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3. 既然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那么，发展仍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但我们所谋求的发展已不是或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发展，而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新时代发展。

这意味着，在跨越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关口的新时代中国，对于规模和速度的关注已经让位于质量和效益，推动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保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与之相匹配，在实践层面，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一套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办法，使之成为主导经济工作的基准尺度，已经箭在弦上。

### （三）政策主线：由需求管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宏观经济政策总要有个主线索，它不仅规定着宏观经济调控的立足点、聚焦点，也决定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着力对象、操作方法和主攻方向，实际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灵魂所在。

从总体上说来，以往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是需求管理。其基本特征是，立足于需求侧并紧盯需求总量，随着经济的周期性波动，针对社会总需求实施立足于短期稳定的“对冲性”逆向调节。每当经济下行、社会总需求不足时，便实施扩张社会总需求的操作。每当经济过热、总需求过多时，便实施紧缩社会总需求的操作。可以说，如此针对社会总需求的收放型管理方式方法，在经过了 40 年改革开放进程洗礼的中国，即便是非经济专业人士，也能大致说出一二，甚至如家常便饭般熟悉。

然而，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全新理念的创造性提出，并且取代需求管理而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以往烂熟于心且运用多年的那一套宏观经济政策机理及其操作办法，便不再如以往那般适用，必须进行相应调整了。

习近平指出，“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发展和经济工作的主线，转变发展方式，培育创新动力，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打造新引擎、构建新支撑”。<sup>①</sup>“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主攻方向，从生产端入手，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益，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侧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sup>②</sup>

这种调整，实质是对需求管理的颠覆性变革，也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向性改变。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 107—108 页。

<sup>②</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 119 页。

1.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立足点在供给侧而非需求侧，那么，其着力对象虽不排除需求，但主要战场已经让位于供给。更加注重在供给侧发力，注重激发经济增长活力，努力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平衡，是其着力的基本出发点。

2.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聚焦点是解决结构性而非总量性问题，那么，其操作方法虽不排除需求总量收放，但主攻方向已经让位于结构性调整，短期的“对冲性”逆向操作尽管不可或缺，但已不再是主要选项。

3.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目标，锁定于提高供给质量和优化供给结构，那么，如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这样的急性病虽仍须纳入医治范围，但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更加着力在结构性调整上下功夫，已然是重心所在。

这提示我们，呈现在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索上的重大调整，意味着宏观经济调控的立足点和聚焦点变化了，也意味着其着力对象、操作方法和主要目标变化了。认识到这一变化不可逆转，在继续运用需求管理思想的合理成分适度收放总需求的同时，走出一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索的宏观经济调控新路子，已成为新时代提交给我们的重要课题。

#### （四）实施机制：由政策性操作到政策与改革联动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总要通过一定的操作环节加以完成。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格局，也需有不同的实施机制与之匹配。

以往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要依托于或体现为政策层面的操作，通过各种政策性变量和政策性安排，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每年一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议题之一，就是谋划、布局来年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样做，显然同主要基于周期性因素和总量性因素的形势判断相适应。如前所述，源于周期性波动和供求总量失衡的矛盾和问题，我们通常是将其当作急性病来医治的。主要方法是通过短期的逆向操作加以“对冲”，一般无需牵动体制机制，往往在政策层面即可完成。

然而，随着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特别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主线索之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必须脱出政策性操作的局限而伸展至体制机制层面，主要依托于改革性行动。

习近平分析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原因是要素配置扭曲，是体制机制障碍”。<sup>①</sup>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讲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就是要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机制，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打破垄断，健全要素市场，使价格机制真正引导资源配置”。<sup>②</sup>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06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15页。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性变化。

1. 既然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已由总量失衡变身为结构失衡，急性病已经让位于慢性病，那么，短期的“对冲性”逆向操作便不再如以往那般有效，而只能在继续医治急性病“供求总量失衡”的同时，将着力点和着重点放在治疗慢性病“结构失衡”上。

2. 既然造成供给侧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性障碍，在于市场未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于政府没有更好发挥应有的作用，那么，针对体制机制性障碍，政策层面的操作肯定力不从心，只能实行体制机制变革。

3. 既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和关键是改革，即在识别供给侧结构及其失衡的基础上，通过改革来改善总供给结构、提高总供给的能力和质量，<sup>①</sup>那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将根本途径放在以改革的办法突破体制机制性障碍，放在以推进各种基础性改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条件上。

这实际上警醒我们，作为匹配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工作主线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虽仍属宏观经济政策范畴，但已不局限于政策层面。除此之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必须包括制度变革，甚至要依靠改革来推动。换言之，须将政策调整与改革行动巧妙结合，将改革的中长期效应与宏观经济政策的短期效应紧密配合，以此获取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动力。

#### （五）政府作用：由拾遗补缺到更好发挥

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抓主要矛盾，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是我们做好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工作的传家宝。

以往面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且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一客观现实，经济工作的着重点和着力点是放在扭转供不应求和短缺经济的现状、做大 GDP 总量上的。因此，“有没有”、“有多少”是矛盾和问题的焦点，增加物质产品和文化产品供给是主要目标，企业部门和市场系统的建设是核心环节，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宏观经济调控的立足点。至于政府的作用，则主要是在市场失灵领域“拾遗补缺”。

然而，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且矛盾的主要方面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不仅经济工作的着重点和着力点发生变化了，政府的作用也随之凸显。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

<sup>①</sup> 参见方福前：《寻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源头》，《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7 期。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sup>①</sup>

围绕这一重大转变提出的一系列新要求，对宏观经济调控的意义绝不可低估。

1. 认识到美好生活需要既是在物质文化需要基础上的“层次提升”——对于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也是在物质文化需要基础上的“范围扩展”——由物质文化需要扩展至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需要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需要，作为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载体，便不仅包括物质和文化产品，而且包括制度和政策产品。不仅物质和文化产品要升级换代，而且制度和政策产品也须进入视野。

2. 认识到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主渠道和着力点有所不同，物质和文化产品的升级换代主要靠市场，矛盾和问题的焦点是从“有没有”、“有多少”转变为“好不好”，着力点应当放在大力提升物质和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效益上。制度和政策产品的进入视野则主要靠政府，矛盾和问题的焦点既包括“好不好”，也包括“有没有”和“有多少”，着力点应当放在将有效满足人民对于制度和政策产品的需要作为新的增长点。

3. 既然市场系统和政府系统对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均不可或缺，两个系统均负有解决或矫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责任，那么，在坚持物质和文化产品供给与制度和政策产品供给并重的同时，应当将优化市场供给和政府供给一并纳入视野，将解决或矫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的责任，同时落实到市场和政府两个系统。不仅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且须“更好发挥政府作用”。<sup>②</sup> 政府不仅要在物质和文化产品领域“拾遗补缺”，而且须在制度和政策产品领域充当主角。

4. 既然当前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更多地表现为对于制度产品和政策产品的需要，制约这一日益增长需要的主要因素又主要在于政府系统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那么，政府系统建设、解决和矫正政府系统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当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找准现阶段影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期盼和需要主要因素的前提下，以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努力，建立起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需要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这昭示我们，在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从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入手，完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格外重要。因此，处理好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注重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注重抓全面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以更平衡更充分的供给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当成为新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11—12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21页。

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各方面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 三、主动“对表”：将新时代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落到实处

说到这里，可以发现，新时代中国面临的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已经大不相同于以往。一个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紧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和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一体系的突出特征是：不仅聚焦于经济发展规模，而且更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不仅着眼于对经济短期波动的调控，而且更注重持续增长动力；不仅依赖于需求侧的总量收放，而且更注重供给侧的结构优化；不仅着力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更注重矫正和解决政府系统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立足于政策性操作，而且更注重制度变革。

应当特别指出，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的这一系列深刻变化，是我国经济发展思路和工作着力点重大而非一般意义上的调整。这种调整不仅是深刻的，而且具有根本性。它不是一个短期概念，而要管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它所触动的，更不限于宏观经济政策实践，而且延伸到作为其基础和支撑的宏观经济理论层面。

认识到经济发展新常态大不相同于经济发展旧常态，高质量发展阶段大不相同于高速增长阶段，新发展理念大不相同于旧发展理念，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大不相同于社会生产落后条件下对物质文化的需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不相同于需求管理，并且，鉴于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已经发生变化，其运行脉络和操作机理已经大不同于以往，当下亟待注意并重点防范的一个问题，就是“新瓶装旧酒”——操用惯性思维面对新形势，复制习惯做法处理新问题。

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异常重要而紧迫的工作，就是主动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对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调整以往习以为常的理念、思想和战略，以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新理念、新思想和新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新时代中国宏观经济调控体系落到实处。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保持定力，坦然应对复杂经济时局，走出一条大不相同于以往的新时代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各方面经济工作的创新之路。

〔责任编辑：梁 华 责任编审：许建康〕

## 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新思维

金 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sup>①</sup>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对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的重要判断，不仅昭示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指出这个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崭新使命，而且提出了重要和紧迫的理论需求——为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提供新的思想指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发展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sup>②</sup>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关切日益超越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关切。在新形势下，经济学需要为观察、研究和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工具。笔者曾研究了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sup>③</sup>本文进一步讨论，应以怎样的经济学新思维，应对新形势新问题，以更好地把握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 一、关于经济行为和发展动能的新思维

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似乎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其实不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如何认识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本质差别，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加以区分。人类经济活动最初的动因是以简单而直接的方式，获取有助于自身生存和种群繁衍的生活必需物品。从采集、狩猎、捕捞到种植、饲养，以至进行各种形式的手工制造劳动，把原先“无用”之自然转化（加工）为可供消费使用之产出品，通过物质生活的生产，首先解决人类生存最必需的吃穿住问题。这样的经济活动尽管符合人类进行物质生产活动的本真目的，即获取供生

- 
-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0页。
- ②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39页）
- ③ 如可参见金碚：《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8年第4期。

活消费的有用之物，但其经济动能却是十分有限的，生产效率也很低下。在生产活动能力范围十分狭隘的自然经济历史条件下，个人无法脱离共同体而独立生存，人类自主活动的发展尚处于马克思所说三大形态最初的“人的依赖关系”阶段。<sup>①</sup>

随着生产力发展的一定进步，人类发现，相互进行有用物品之间的交换（W—W），可以提高有用物品的可得性和劳动成效，因为这使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在劳动分工和交换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行为（W—G—W），成为被广泛采用的市场交换关系。<sup>②</sup>这里用马克思采用的符号表达，W代表商品（有用品），G代表货币。此时，经济活动的动因仍然具有朴素理性主导的特征，即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生产者之间各自剩余产品的交换仍以换取有用品进行生活消费为动机，以便直接满足物质生活生产自身的需要。但如马克思所论述的，W—G—W简单商品流通的普遍发展，会导致社会经济关系的质变，转向G—W—G'资本流通方式的动力机制，原先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行为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转变为以获取更多的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货币（G'）为目的的行为方式和经济运行机制，以这样的生产和交换关系为主导的社会经济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sup>③</sup>同时又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sup>④</sup>“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sup>⑤</sup>这样，经济活动的朴素理性机制，就转变为以工具理性<sup>⑥</sup>为主导的动力机制，经济活动的直接行为目标不再是其本真目的，而是无休止地追求工具目标G'，即资本价值的不断增殖，表现为对货币资本增殖积累孜孜不倦的追求。于是，经济活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关系反转了。同时，劳动“表现为手段”，“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sup>⑦</sup>

显然，与以前的朴素理性相比，以工具理性主导的经济机制具有强大得多的动力。因为前者的行为目标量（满足对有用物的需要）是有限的，使用价值也不宜长期储存，而后者的目标值（货币量）则可以无限积累。这就导致了一个影响极为深远的社会历史后果：经济活动行为目标的转变，使得“贪婪”之心登上了人类发展舞台，并成为其核心“动能”的心理原由（亚当·斯密称之为“人类本性的欺

① 马克思论述了人类发展的三大社会形态（形式），即“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性”和“个人全面发展”。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108页。

②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但不居主导地位。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9页。

⑤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97页。

⑥ 工具理性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概念，源自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韦伯将目的和手段的合理性称为价值（合）理性和工具（合）理性，后者指行为由追求功利的动机驱使，只追求手段效果的最大化，无视目的的合理性。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9页。

骗”)。这样的行为目标机制尽管动力非常强劲,但也正因为如此而可能“令人痴迷”,并产生人类发展中的“认知俘获”<sup>①</sup>现象,导致对经济发展本性的认识扭曲。马克思称之为社会的“异化”现象,或“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性质。这样的“认知俘获”致使人们倾向于极为亢奋甚至疯狂地追求交换价值量(货币额),即使它只不过是信用货币体系中的符号“数字”(账户记录)。在无止境地追求货币财富积累的贪婪动机驱使下,不生产任何真实使用价值的“虚拟资本”急剧膨胀,以至产生奇特的“理性的非理性”和“非理性繁荣”现象。如果用符号表达就是: $G-G'-G''-\dots$ 。

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经济学思维严重倾向于工具理性主导,不仅畸形偏重追求交换价值(货币)的经济行为,而且尽力舍象所有难以用货币计量的物质生产生活因素。经济学的这种思维特征并非完全是人类认识的“误解”或“无知”,而是上述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不是心里不明白,而是身不由己。作为商品货币拜物教的意识,这样的经济学思维把所有被市场“原子化”的个人,都视为“理性”的“经济人”,以这样假设的经济学基本理论为依据,反过来进一步塑造现实经济状况,发挥经济思维的“教化”作用。精于算计的自利行为(精致的个人利己主义),追求货币财富的最大化,被认为是“正常人”的行为,是“天经地义”的人类本性。被“俘获”的认知以及由其主导的普遍性经济行为倾向,同现实经济运行过程高度“纠缠”,相互推动,双向强化,使得作为人类经济发展目的的本真性,与作为目的之手段的工具性的关系完全反转颠倒。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从世界历史时代演变的高度,深刻揭示了经济发展的本真性与工具理性关系颠倒而导致的社会形态结果。他将这种历史性的颠倒界定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资产阶级社会”时代。这实际上就是上述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二阶段。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中,人被物所统治,人为货币财富的积累所役使,原本作为 $W-G-W$ 简单商品流通转瞬即逝中介的货币,成了整个商品世界至高无上的上帝。由于人类尚未进入马克思预见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的人类发展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关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演进的进一步展开,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把走向未来新社会实际发展状况的研究留给了后人。马克思只是科学地预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规律(剩余价值规律)终将让位于以时间节约为首要规律的人的自主活动,沿着本真理性主导的人类社会发展,未来新社会将是“个人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

今天,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和世界经济的高度现代化,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在创造一定的条件,逐渐拨开迷雾,启蒙明智,使经济学摆脱导致

<sup>①</sup> 即指对事物性质认识的根本性扭曲,认识严重地背离事物本性。

经济发展本真性扭曲的“认知俘获”成为可能。我们致力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就体现了关于人类经济发展新动能之理性思维的进步趋向。在新时代中国，人们和社会将更理智地认识和对待市场经济发展中社会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sup>①</sup>在各种体现了社会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发展目标中，进行适当的权衡，以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和满足的充分性。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认识和思维方式将发生重大改变，在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基础上，以更为科学理性的精神，反思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经济发展中，马克思揭示的劳动二重性、商品二重性及其相互关系，拨正人类发展走向升华的方向，明智选择能使目的得以实现的更好手段。

从理论上说，这实际上就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高度，告别“落后的生产力”状态之后，社会开始进入本真复兴的新时代，表现为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同人类本真理性逐渐形成“平权”的均衡态，而且本真理性将不断取得更大优势。这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自觉性对自发性日益增强的驾驭能力，踏上如马克思所说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征程。从经济发展动能机制的基本特征来观察，可以看到，以工具理性为主导，虽然动力强劲，且仍具有历史必然性，但却可能迷失方向，人类曾竭尽全力追求“黄金时代”，却未料落入了“镀金”陷阱。坚持本真理性就是要力求体现经济发展对人类活动自主发展的真实社会意义，由此引领的新动能将从根本动机和激励机理上把握经济发展的正确航向，在新时代真正走向“自由”之路。我们会真正懂得，方向比努力更重要，只有方向正确，努力才有价值和意义，否则越是努力，危险就越大。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的新思维，实质上就是要坚持以本真理性驾驭工具理性的科学精神，努力形成和有效发挥具有方向自觉性和激励有效性的经济发展动能机理。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论新思维。

## 二、关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目标的新思维

以上讨论涉及马克思人类发展在“物的依赖性”第二阶段为“个人全面发展”第三阶段创造历史条件的问题。从发展动能来看，这也就是人类从盲目的动能，向

<sup>①</sup> 商品的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其内容与形式的关系，《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象形态时，往往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对应使用。“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51页）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第一章第一小节的标题就是：“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或价值本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1页）在自然经济中，产品的使用价值是生产者自己的消费对象，不具有社会性；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其使用价值只是买方的消费对象，故马克思把作为交换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称为社会使用价值，这一变化在资本流通中成为普遍现象。

具有方向自觉性的动能转变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工具理性仍将是实现本真理性的的重要动力，但不应再是天马行空式独来独往的盲目力量。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且能够获得新动能，更能体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本真性目的。<sup>①</sup>这就需要进一步研究，在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好以交换价值主导的工具理性与以质量关切为主导的本真理性之间的关系。<sup>②</sup>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传统经济理念的局限，加之经济学对“精确”、“严密”、“逻辑自洽”的追求，西方主流经济学越来越具有高度形式化、数学化的特征。工具理性主义因而成为西方经济学最值得“骄傲”的特征，经济学也因此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诚然，工具理性对于经济学的方法论具有相当的重要性，经济学研究的形式化（数学化）并非没有价值和学术意义，它的确可以增强经济学表达和分析推断的逻辑严密性。但是，如果以工具理性替代、掩盖甚至排斥人类经济活动的本真价值，或者因追求形式化（数学化）而使经济学远离现实，在“象牙塔”的黑板上自娱自乐、自我欣赏，就会使经济学失去科学的解释力和预测力，甚至误入歧途，迷失方向。如果以这样的经济学思维方式作为现实经济发展的指导理念，就会走向盲目追求工具性目标（如人均收入、GDP等）的方向，而忽视难以直接用货币数量指标来显示的本真价值目标（如生态环境、人民幸福、社会公平等）。可见，新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新思维应体现为：工具理性不失本真价值，形式化（数学化）方法不失实质性内涵。

借用马克思所采用的符号，这样的新思维可以用公式简洁地表示为： $W-(G-W-G')-W'$ 。其中， $(G-W-G')$ 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过程，即追求经济价值和高效率仍是内在的动因机理，但这种工具理性机理必须服务于并最终体现为更高质量的社会使用价值质态  $W'$  的创造，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遵循这一新思维逻辑，经济发展如何形成新理念，形成新的指导思想及其实现方式，使具有工具理性的经济机制不失其本真价值的主导方向，使形式化（数学化）的指标追求不失其实质性内涵，让增长指标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社会使用价值质量和结构的提升，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便是一个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完成的重要理论课题。

我们可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以工具理性为主导的思维方式，相当于独眼看世界，即闭上观察社会使用价值对人类自主发展具有直接有用性（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本真性目的和要求）的一只眼，而睁大观察交换价值（以货币计量的“最大化”目标）的另一只眼（因为在现实中商品的“价值”是无法看见的）。新时代中国的思

<sup>①</sup> 参见金碚：《论经济发展的本真复兴》，《城市与环境研究》2017年第3期。

<sup>②</sup> 参见金碚：《本真价值理性时代的区域经济学使命》，《区域经济评论》2018年第1期。

维方式需要转变为越来越关切社会使用价值（质量要求）的重要性。工具理性与本真价值理性进入“平权”状态，相当于睁开双眼看世界，既要关切社会使用价值也要关切交换价值，而且力求二者实现平衡性和充分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是必须特别关注的新时代中国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独眼看世界有时可能感觉很“准确”、“精道”，其实往往忽视了真实世界复杂的立体性、多维性和丰富性。只有双眼看世界，才能观察得更真切，既发挥工具理性注重效率、速度、效益等优势，又能把握经济行为之人民主体性的本真目标，不迷失生产满足人民真实需要的正确目的。

例如，“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果为了金山银山而要破坏绿水青山，那么，“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不要大开发，而要大保护”……习近平总书记对经济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原则观念，都体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思维，是双眼看世界新思维方式的真切体现。如果说在政治思维上要强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在经济思维上则要提倡“不忘本真，关切质量”。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论新思维。

### 三、关于经济主体及主体需要的新思维

当我们讨论到以社会使用价值质态所体现的经济质量，以及“满足人民需要”为经济发展的本真目标和现实动因时，就触及了传统经济学一个极大的软肋。众所周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地吸取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合理成分，将劳动二重性和商品二重性作为其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并贯彻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之始终。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回避对交换价值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研究，将体现交换价值涵义的货币财富积累作为核心概念（他们根本不懂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说：“‘财富’一词用来表示为人类所有的有形物件（或实物）。根据这一定义，某一物件若要成为财富，只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必须是有形的（material）；第二，它必定是有主的（owned）。也有人加入了第三个条件——它必须是有用的（useful）。不过，尽管有用性的确是财富的一个本质属性，但远谈不上有什么特别之处，有用性隐含于占有特征之中，放在定义中略显多余，故而可以删去不表。”<sup>①</sup> 所以，经济学不必关注使用价值，只要将使用价值视为财富所提供的“服务”即“效用”就可以。这样的简化或抽象即使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也许可以接受，但毕竟具有极大的局限性。第一，认定拥有财富就是拥有使用权，拥有使用权就等同于实际对它们的使

<sup>①</sup> 欧文·费雪：《资本和收入的性质》，谷宏伟、卢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8、22页。

用或真实享用，这与实际情况不符。许多情况下，拥有使用权，未必就实际使用或真实享用，有用物（产品）的“过剩”、“冗余”、“闲置”、“浪费”、“损坏”等现象常常发生。马克思说：“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使用就没有用，就是废铁和废木。不仅如此，它还会遭受自然力的破坏性的作用、也就是发生一般的物质变换，铁会生锈，木会腐朽。”<sup>①</sup> 第二，反之也普遍存在以下现象。许多人在对有用之物并未拥有产权的情况下，却可以实际使用，对有用物的实际享用未必以私有财产权为条件，如许多公共场所、基础设施等都是如此。又如，许多产品（物质财富）在一定的集体成员中是可以或总是共享的，一些产品（物质财富）在一定的社区范围内人人可以享用，而自然生态环境则更是大众共享的自然财富。所以，用财产权替代使用权，将占有等同于享用，是传统经济学脱离现实的独断性假定。按照这样的思维定势，将所有的享用都认定为权属性消费（拥有所有权或支付货币才能消费），极可能产生或诱致严重忽视非财产属性的社会使用价值（如生态环境），以及扭曲各种非权属性供需关系（如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的行为倾向，更使得经济活动内在的、且为人类发展追求的福利“共享”性失去基础。而马克思的逻辑截然不同，人类发展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的条件表现为社会化的高度发展，它们“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sup>②</sup> 沿着马克思人类自主活动全面发展的思维逻辑，社会财富观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与上述财富观直接相关并更为重要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假定只存在个人主体，不存在“人民”这一行为主体，主张财产权只能以个人定义（私人拥有）。因为产权必然意味着，一些人排斥另一些人的权利，如果主张所有人都拥有的产权，就相当于没有产权定义的边界。他们认为，在经济学中，“人民”是无法定义其主体产权的，即使将“人民”算作经济主体，最多也只属于“没有感觉”的主体，而没有感觉的经济主体均不是真实的利益主体，最多只能算是“虚构的主体”。据此推断，“企业”也是虚构的利益主体，即没有感觉的“法人”。按照他们的思维方式，真正有实质意义的仅限于关于个人（私人）效用（福利）的判断，不存在关于“人民”享有的使用价值和效用（福利）的判断。他们认为，所谓人民利益的决断不过是以一定议决程序做出的“公共选择”，公共选择的结果并不代表人民的真实福利（集体利益），不过是达成了不同个人各不相同利益诉求的妥协，并非真实存在的集体利益，服从一定程序而勉强达成的公共认可，若采取另一套公共选择程序，就会得到公共妥协认可的另一种结果。

以上述思维来认识和引领经济发展，显然是十分狭隘和非常不恰当的。在现实中，财产权与使用价值的关系有着各种复杂情况。舍象了使用价值因素（将使用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09页。

值完全归为或消失于个人占有权),实际上也就舍象了人类经济活动真实主体的本真性,绝非明智之举。特别是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方面个人所需要的有用产品(包括服务产品)越来越丰富多样;另一方面,众多个人并非必须通过获得私人财产权来获得相关社会使用价值权益(使用或享有权)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如优良的生态环境、各种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等。各种各样产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形态和质量特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生产、消费及供求关系,将表现出越来越丰富的多样化趋势,亟待以新的思维和理念来引领新时代经济发展,尤其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优化产品供给机制,提供更多具有高质量社会使用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更大的理论挑战性是,以怎样的新思维和理论严谨性,界定作为真实经济主体的“人民”,以及如何使由此确定的人民主体的需要及向往得到满足。不同的个人需要及其满足,与人民需要及其满足之间又有何等关系或关联。在现实中,“所有人都拥有的产权或享有的权利”并非悖论,“人民”完全可以成为真实的集体利益主体。当人民利益的整体或局部受损益时,其中的群体或个体的感受不仅是真切的,而且可以且必然迅速传递给作为人民成员的众多群体个体。例如,气候条件及其变化影响着所有人(人民)的整体和个体利益。当人民作为利益主体时,一些成员的严重受损,就会被感受为人民的整体受损。即“人民”主体的损益感受,往往会表现为“一个不能少”的局部—整体关联性特征。这一特征显著不同于传统经济学以原子型个人主体或黑箱型“企业”主体为假设前提的理论逻辑,也不同于传统福利经济学所假定的微观经济主体间绝对个人主义的福利评价原则。<sup>①</sup>所以,以人民主体的新思维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整个社会所提供的各类产品的社会使用价值质量状态及结构特征,经济主体的福利评价,以及相关体制机制和政策的安排等,都是经济学必须着力研究的重大问题。这就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有的主体论新思维。

#### 四、关于结构性和精准性的方法论新思维

从上述关于人民作为经济主体的思维逻辑中,必然推导出关于经济发展目标函数的新思维。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具有更加体现质量特征的复杂性质,特别是质量感受主体不仅有众多个体,还存在“局部—整体”结构性关系上的“全体人民”。因此,着力形成“结构性”和“精准性”的新思维,是经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重要的方法论要求。这意味着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将体现为,经济活动必须摆脱经济发展过程物支配人的拜物教性质,物的创造不应是为物而物(为生产而生产),而是为了人民需要的满意和生活幸福。经济发展的指向(目的)不再是物

<sup>①</sup> 其实,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一书中曾论述了人类具有“同情心”的这一重要心理特征——人对其他人境遇的感同身受。

质财富本身，而是物质财富满足人民需要程度的本真价值，必须洞察经济结构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质意义，而不仅仅以堆砌甚至闲置的物质财富量论英雄，更不应以炒作倒卖金融财富为荣。

众所周知，传统经济学主要着力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观察和研究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两个层面的现象及其关系。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微观主体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以个量及个别价格的局部均衡为主要变量和工具，设置函数关系。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经济总量均衡，以总量（宏观）指标为分析工具及数量目标。这两类经济学的主体框架都假设市场能够出清，因而尽可能地回避结构性问题。但是，当我们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特别是考虑到具有“局部—整体”结构性关系的“全体人民”主体时，经济体及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现象和问题恰恰成为关注焦点。在现实中，弥补结构性缺陷、消除结构性失衡现象，往往成为解决经济高质量发展问题的主攻方向。中央政府尤其把实施阶段性的“补短板”战略，作为整体提升发展质量的重要举措，通常称为“木桶原理”。由于木桶的总体质量（盛水量）是由它最短的一块木板决定的，所以集中全力专注于改善（加长）木桶的最短板，就成为提高木桶质量（盛水量）的战略重点。当前，中国确定的化解重大风险（尤其是金融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就是采取“补短板”的非一般均衡常规战略，体现了经济发展新思维的重大实践举措。这三大攻坚战，针对的就是当前影响发展质量的最短板或最严重隐患，聚焦于人民主体的重大利益关切。

在传统经济学研究方法中，对结构性和精准性问题的关注是一个明显的薄弱环节。一方面，其倾向于断定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可以像一只“看不见的手”那样，有效地使经济运行保持均衡，因而无需特别关注经济结构中的短板现象和矛盾，也就难以想象（或不必要）应当采取精准性的非常规应对举措，解决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如果要采取什么结构性的政策举措，又往往落入传统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使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损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制，因而难以找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有效方式。而无论是市场调节还是政府干预，传统经济学因迷信无处不在的虚假一般均衡论，完全舍象了经济主体存在的内部结构关系，使之成为不知所然的“黑箱”，或者认为那不是人的理性及信息处理能力所能解决的问题，只能留给“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来盲目地碰对。这种漠视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跨越必然不断遭遇的结构性障碍尤为致命。

因此，关注“结构性失衡”，达到经济对策的“精准性”要求，是推进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必须具备的重要新思维方式，也是转向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经济学研究的创新发展需要突破的一个重要难题。从更大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复杂性研究不啻为当代经济学发展中具有根本性变革意义的思维更新要求。

以往的微观经济学，只是假定市场稳定器能够自动实现“精准性”的供求均衡；宏观经济学，也假定即使市场没有达到完全“出清”，所影响的总量失衡也是暂时的

“赤字”，回归均衡只是时间问题，不必考虑或担忧市场机制能否“精准性”地调节基于使用价值的具体产品或要素的供求平衡关系问题。尽管经济学运用了高深复杂的数学方法和模型，以局部均衡或一般均衡的函数关系为主要方法，但这样的“黑板经济学”对于解决实际经济发展中动态的“结构性”和“精准性”问题，总是力所不及，实为以“精准性”的学术形式和数理表达，掩盖精准性应对真实问题的无能为力。因此，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为精准解决现实经济发展中迫切的结构性问题，经济学亟待以新思维引领的更大努力，取得学术研究的新进展新突破。

困难在于，过去当经济发展处于高速度增长阶段，经济行为的目标比较单纯，甚至可以由唯一的重要指标如GDP增长率进行较简单的观察和评价；而当经济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质量的多维性及其一些方面的非量化性，使得“精准性”思维可能遭遇同实际现象具有模糊性特征的矛盾。例如，个人或地区的“贫困”特别是贫困的感受程度，就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概念，但实施有效的扶贫行动，却必须具有精准性，否则脱贫成效就难以落地，甚至可能南辕北辙。再如，防范化解风险，也是一个具有模糊性的概念，“风险”就是不确定性，而消除所有风险和不确定性是无法企及的，也没有必要。因此，防范化解风险的举措必须要有复杂性思维下的精准性，体现结构性的多样态，否则就可能无的放矢，盲目治理，难见成效。兼备结构性和精准性的复杂性思维，是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和实践性问题。

在实践中，结构性和精准性思维往往表现为“底线思维”方法，把守住底线、在底线环节上着力，以此作为解决全局性问题的关键。习近平强调的“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sup>①</sup>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底线思维的战略重点。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胜利，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就将全盘皆活，可以在稳中求进的基础上，显著提升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质量水平，并拓展未来发展的巨大空间。这是体现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论新思维。

## 五、基于新发展理念的策略法则新思维

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学是关于人类经济行为中进行选择决策的学问，更确切地说，是关于选择经济决策所基于的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学说。在这一意义上，经济发展理念归根到底是关于选择决策的基本思路原则。按照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维，主要有两类选择决策问题。一是微观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二是关于集体决策的“公共选择”。这两类选择决策都基于个体利益，超越个体利益之上的集体利益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27—28页。

选择决策，归根结底只是基于个人对自己福利（私利）的感受和判断。对于经济主体设定的这种思维定势，阻碍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入认识。这种以绝对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经济选择思维，更难以应对诸多政策目标的选择和排序优先问题。

如前所述，经济高速增长阶段追求的目标相对单一，战略和政策目标的确定和决策相对简单，尽管宏观经济调控也有多个政策目标，也需要进行一定的权衡取舍。当然，即使在经济较落后的发展阶段，也往往会更倾向于实行结构性的产业政策，但从其政策目标的性质上看，所追求的实际上仍然主要是“高速增长”这一相对单一的主导性目标，压倒性地以高速赶超作为最基本的政策取向。工具性目标终归是主要关切点，经济增长率总被视作可以“一俊遮百丑”的指标。

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情况显著不同。高质量发展涵义的多维性体现为政策目标的多元化，多元化是高质量的本质特征。其中不仅有工具性目标，而且有更重要的本真性价值目标。因此，新时代中国不仅在国民经济总体发展上，而且在经济体系的各个层面和领域，都会要求进行提升发展质量的策略权衡，在各项多元政策目标间进行选择，尤其是进行复杂的协调性优化。传统的个体自由选择 and 公共选择思维和方法，不能适应这样的新形势，需要一种以人民为集合性主体（集体）进行“协调选择”的新思维和新方法论，以实现集体性的“共享”为根本目标。共享的主体是“全体人民”，人民利益整体与局部的受损或获益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权衡，在协调中做出战略性选择决策。人民主体的共享抉择，同个体自由选择及公共选择具有显著差别。无论在时间跨度还是在空间尺度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对人民主体的利益目标和选择行为的确定与协调，都根本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思维的判断原则和优化准则。人民主体可以有“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的目标眼界，而其他利益主体和公共选择不会有这样的理性。人民主体可以有“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的包容性，其他利益主体和公共选择也不会有这样的理性。

正是从人民利益出发，才能奠定经济发展新理念的逻辑基础，形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思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sup>①</sup>这一新发展理念强调的创新引领，统筹协调，绿色环保，扩大开放，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民对发展成果的共享。共享的实质如前所述，就是关于人民主体整体和局部利益的权衡和多元政策目标的协调优化选择。这样的政策选择决策，必须遵循基于新思维方式而确立的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理念。中国新时代发展战略理念，一方面继承了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的成功实践形成的正确理念，特别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发展是硬道理”的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21页。

原则；另一方面也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纠正偏差，与时俱进地提出未来发展所要遵循的战略原则和基本行为法则，不再以追求增长速度为唯一压倒性目标，更加注重体现本真价值的重要策略目标，使经济发展更具有方向、路径、方式和模式的科学合理性。这一新的发展战略理念和策略原则，系统和深刻地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思维，表现在动力论、价值论、主体论及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或积极创新意向。在此基础上要进一步研究，基于新发展理念确定的战略原则，如何具体化为期望实现的现实（或实践性）目标，以及因此遵循的行为法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我们要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sup>①</sup>这实际上就是指出了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新时代经济发展战略的着力方向和必须遵循的基本行为法则。

——“更高质量”体现价值理性原则。这是由经济发展的本真性质所决定的。如果背离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基本法则，经济发展就失去了根本意义。

——“更有效率”体现工具理性原则。在新时代中国，工具理性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但应更具有科学性。在工具理性的各个行为目标中，速度、规模、营利等目标集中体现为效率目标，其中的效率目标最接近于实现本真价值理性目标的要求。

——“更加公平”体现人民主体原则。“人民”作为集合性经济主体，其利益获得感集中体现为公平性。实现人民主体全体成员的普遍公平获益，才能最终达到人民总体福利目标。

——“更可持续”体现和谐永续原则。全面协调以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经济发展的长久性根本价值，据此可以实现经济发展进程中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及人民主体真实获益永续繁衍在新时代中国的历史统一。

可见，基于新发展理念的新思维，奠定了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选择的决策原则，也是关于发展路径和模式创新的抉择原则。进一步说，这是构建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和确定基本行为法则的主导原则。总之，战略、路径、模式、政策、体制、行为法则等，都是新理念新思维的显性化和具象化。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和实现，取决于高质量发展经济学新思维的突破和传播，更取决于新思维在实践中的贯彻落实、全方位展现和不断的经验总结。

〔责任编辑：许健康〕

<sup>①</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35页。

# 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意义与实践路径<sup>\*</sup>

闫 坤

党的十九大宣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伟大征程的行动总纲领。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首次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目标和途径。

习近平历来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始终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入思考中国农村发展问题。他关于农村工作的历次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我们党“三农”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过去五年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科学理论，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行动指南。追溯习近平乡村振兴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出的理论渊源和时代意义，从学理上研究其主要内容和重大创新，理解和把握思想实质，将利于更好地指导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实践。

## 一、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渊源与时代意义

习近平乡村振兴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形成，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乡村发展和城乡融合经典论述的基本理论，针对中国具体国情，创造性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对基本矛盾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同时借鉴人类关于农村发展的有益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认为，农业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sup>①</sup>“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全部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sup>②</sup> 农业劳动生产率制约农业和工业之间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决定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以及农

<sup>\*</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张海鹏、郜亮亮对本文主要思路和观点的形成以及资料整理方面有所贡献，在此表示感谢。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8—29页。

<sup>②</sup>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88页。

业人口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和规模。<sup>①</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最初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局限于狭隘的物质生产方式,不存在城乡差别,一旦农业劳动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社会分工就会发展,引起城市与乡村的分离。他们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sup>②</sup> 人类文明的这一进步,推动了社会 and 经济发展,同时造成了城市 and 乡村的对立冲突。他们分析了资本原始积累 and 产业革命的胜利,如何彻底颠覆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乡村对城市的统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对抗形式,“向城市集中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sup>③</sup> “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sup>④</sup> “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这样,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资本主义现代农业的发展“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sup>⑤</sup> 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镇化造成了这样的社会结果,“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sup>⑥</sup> “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sup>⑦</sup> 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人类社会城乡对立的根源,一方面是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产物,另一方面,这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最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夺取政权后应当立即采取的十项措施时指出,“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

① 参见何增科:《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基本观点述要》,《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5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3页。

④ 《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57页。

⑤ 以上引语见《资本论》第1卷,第578、579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4—185页。

步消灭。”<sup>①</sup>恩格斯写道，作为废除私有制的结果，未来新社会将“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sup>②</sup>“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sup>③</sup>它在落后国家最慢最困难，在先进国家最快最容易。对于像法国这样小农仍占人口多数的落后国家，当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后，组织和发展合作社是农业农村向新社会过渡的主要社会形式。“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sup>④</sup>生产资料的“用益权，至少在过渡时期难以无偿地转让给个人或团体”，“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全部劳动工具，决不排除保存租赁关系”。<sup>⑤</sup>例如丹麦有许多大的个体农户，“应当把自己的土地结合为一个大田庄，共同出力耕种，并按入股土地、预付资金和所出劳力的比例分配收入”。<sup>⑥</sup>规模经营不但会使现代科学技术得以在农业农村得到有效利用，而且农村的部分劳动力将会多余，有两种办法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或将邻近村庄土地拨给农民合作社支配，“或是给这些农民以资金和机会去从事工业性的副业，尽可能并且主要是供自己使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都会有所改善”。为了逐渐把农民合作社转变为更高级的形式，“使整个合作社及其社员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跟整个社会其他部门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平等的地位”，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那时将有能力给这些合作社提供更多的便利”，包括低利率的抵押债务贷款和社会资金抽拨贷款。<sup>⑦</sup>恩格斯同时告诫：“试图预先面面俱到地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制造空想，这种事情我留给别人去做。”<sup>⑧</sup>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未来新社会城乡融合发展的途径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重视农业现代化和技术化；二是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历史先导作用和文明辐射扩散功能；三是合理布局城乡生产力和产业结构，包括工农生产的有机结合、生产力的计划利用和平衡分布、人口的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22页，并见该页注释2：“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共产党宣言》是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基础上撰写的，恩格斯当时在写第九条措施时还提道：‘把城市和农村生活方式的优点结合起来，避免二者的片面性和缺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8—3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6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0页。

⑦ 以上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6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0—371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67页。

均分布,以及城乡之间文化和生活条件的日益接近。<sup>①</sup>

发展经济学关于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发展的理论及其所反映的现实,也基本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城乡对立的经典论述。按照刘易斯等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农业和农村的主要功能是被动地向工业和城市转移过剩劳动力;舒尔茨则认为,需大幅提高传统农业部门的生产率,释放部分劳动力,使其流向工资较高的工业部门。<sup>②</sup>舒尔茨优先发展农业的主张得到张培刚<sup>③</sup>等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的支持,他们提出了工农、城乡一体发展的思想。从世界范围来看,离开了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的发展,乡村衰落成为现代化及城镇化的普遍现象。面对这一挑战,发达国家纷纷采取应对手段。相反,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生产力落后和实行私有制,只能任凭乡村衰落不断加剧,<sup>④</sup>纷纷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农业占GDP比重降到15%以及城镇化水平达到50%以上,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有利时机。<sup>⑤</sup>

乡村振兴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时代意义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划清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与资本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根本界限。习近平指出,“发达国家大多数走的是剥夺农民土地,通过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来带动农村市场化发展,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如果照搬发达国家的模式,不仅会进一步扩大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使现代化建设成为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还会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沦为城市贫民的问题。”<sup>⑥</sup>“尤其是要看到,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粗放扩张、人地失衡、举债度日、破坏环境的老路不能再走了,也走不通了。”<sup>⑦</sup>

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农民问题始

① 参见周志山:《从分离与对立到统筹与融合——马克思的城乡观及其现实意义》,《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叶昌友、张量:《马克思恩格斯城乡融合思想》,《求索》2009年第12期。

② W. A.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r,”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vol. 22, no. 2, 1954, pp. 139-191; 西奥多·W.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

③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④ 参见 Yansui Liu and Yuheng Li,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Nature*, vol. 548, 2017, pp. 275-277.

⑤ 参见宋洪远:《调整城乡关系:国际经验及其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3期。

⑥ 习近平:《农村市场化: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人民日报》2002年4月28日,第9版。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59—160页。

终是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1949年中国人民重新站起来后，面临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国民经济总方针的贯彻落实，遇到农业社会综合国力薄弱的种种限制。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现代化为逐步消灭城乡对立、巩固工农联盟初步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但农业和农村长期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提供的资金积累，严重削弱了乡村自主建设的能力，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根本改观，甚至在体制上有所固化。1978年，中国踏上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征程，农村改革率先在集体经济的经营方式上取得重大突破。1999年修订宪法对农村改革成功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了总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sup>①</sup>正如习近平所总结的，“改革前，农村集体土地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合一，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搞家庭联产承包制，把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权分开，所有权归集体，承包经营权归农户，这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大创新。”<sup>②</sup>家庭承包经营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农村家庭开始富起来。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78年的2.57下降到1983年的1.82，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水平。<sup>③</sup>但是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重心再次转向城市，城乡差距在波动中趋于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党中央针对城乡发展的现实，对城乡关系不断作出重大调整。从2000年的农村税费改革，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基本方针，再到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以及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sup>④</sup>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一直延续到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000年的2.79升至2009年最高的3.33。<sup>⑤</sup>

此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贯彻新发展理念，勇于推动“三农”工作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农业农村发展发生了历史性变革，粮食生产能力达到1.2万亿斤，六千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农村教育明显加强；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农民收入增速超过经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75—176页。

③ 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的有关数据计算。

④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07年10月25日，第1版。

⑤ 根据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计算。

济增速，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城乡关系朝着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sup>①</sup> 习近平总结说：“由于欠账过多、基础薄弱，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依然比较突出”，而“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具备了支撑城乡发展一体化物质技术条件，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特别是要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上，“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着力点是通过建立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目标是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sup>②</sup>

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很大程度上表现在乡村。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sup>③</sup> 这一战略的实施成功，将拓展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消灭城乡对立和差别提供全新选择，为人类发展贡献具有时代意义的中国智慧和方案。

## 二、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与创新

乡村振兴战略在继承党的“三农”发展思想和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全新的理念，系统回答了农村“为何振兴、怎么振兴、谁来振兴、为谁振兴”的问题。

党的十九大规划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乡村振兴战略思想是其中指导农业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行动纲领。农村现代化被纳入国家现代化体系范畴，丰富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内涵，发展目标针对的不仅是工农业之间的社会分工，还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长期关注的城乡分离的地域分工，以及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裂、人与自然分裂的重大问题，实际上是要求农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全方位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是从产业角度对农业的要求，与工业化相对应，也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途径；农村现代化则与城市现代化对应，是对农村整个空间区域发展提出的要求。农村现代化比

① 参见闫坤、张海鹏：《决胜建成小康社会的农业发展蓝图》，《经济参考报》2017年11月2日。

② 《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 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人民日报》2015年5月2日，第1版。

③ 《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第1版。

农业现代化的内涵更丰富也更复杂，农业现代化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sup>①</sup> 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主要方面，在乡村表现得最为突出。习近平指出了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亿万农民的内在关系：“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农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关键所在，也是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质量的关键所在。”<sup>②</sup>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 20 字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相互联系地涵盖了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所有主导面。与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要求相比，新 20 字方针时空维度的理论和实践性更深刻，立意更高远，逻辑关系更科学。

一是顺序有所调整，原来居第二项的“生活宽裕”调整为“生活富裕”并移至新方针的最后一项，表明乡村振兴战略将最终目的锁定为农民生活的富裕，充分体现发展为人民的根本宗旨，回答了“谁来振兴，为谁振兴”的问题。“生活富裕”与新农村建设要求的“生活宽裕”相比，宽裕类似于温饱层级的要求，富裕意味着不但完全脱贫，而且具有较好的消费力，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赶上来、不掉队，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sup>③</sup>

二是内容有所调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物质基础，相比“生产发展”要求更高，明确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基本动力。“产业兴旺”要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还要在产业形态业态上有所创新，树立并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将农村的各种要素资源禀赋转化为产业优势。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的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作为新 20 字方针中最具创新性的要求，“生态宜居”相比“村容整洁”更加突出绿色生态的引领作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这就要求加强对农村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维系，从厕所革命抓起，强化对农村生态环境严重污染的综合治理，统筹绿色发展对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治理，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利用市场机制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让乡村的美丽整洁和生态宜居变成人民所有的新生产力。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治理有效”又是乡村振兴的人文基础。“治理有效”相比“管理民主”更好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方略，表明党对农村工作的管理思路发生重大变化，要求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

① 参见袁金辉：《中国农村现代化的基本内涵与经验》，《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5 年第 4 期。

② 《这件事，十九大后习近平多次提及》，2018 年 8 月 6 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8-08/06/c\\_1123226849.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8-08/06/c_1123226849.htm)，2018 年 8 月 7 日。

③ 参见韩俊：《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新旗帜和总抓手》，《求是》2018 年第 5 期。

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一创新反映了党和政府从管理国家到治理国家的跨越,<sup>①</sup>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指明了方向。在这个体系中,自治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法治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保证,德治是健全乡村治理的支撑。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乡村善治格局。“治理有效”比“管理民主”更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sup>②</sup>按照后文所述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要求,乡村治理须把夯实基层基础作为固本之策。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与新农村建设的 yêu求相比,这是唯一没有发生变化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乡风文明建设进展缓慢。习近平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精神风貌怎么样”。<sup>③</sup>“要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和公共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深入挖掘优秀传统农耕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培育挖掘乡土文化人才,弘扬主旋律和社会正气,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sup>④</sup>乡风文明建设依赖乡村文化的振兴,还能降低经济活动的社会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乡村振兴战略对怎么振兴作了系统论述。2017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面阐述了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七条道路”——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sup>⑤</sup>2018年3月“两会”期间,习近平又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sup>⑥</sup>乡村振兴的主要任务是在农业和农村两个层面建立现代化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构建农业农村现代产业体系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任务。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不能走老路,要坚持乡村绿色发展,以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质量兴农,着力提高农业的创新力、竞争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要以绿色发展引领生态振兴,将乡村的“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与农业一二三产业体系融合,形成立体式的农村现代产业体系。

① 参见郎友兴:《破解乡村振兴的浙江命题》,《浙江日报》2018年1月18日;郭翔宇:《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2017年12月31日, [http://ex.cssn.cn/index/index\\_focus/201712/t20171231\\_3800105.shtml](http://ex.cssn.cn/index/index_focus/201712/t20171231_3800105.shtml), 2018年2月1日。

② 参见郭翔宇:《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指导思想和战略部署》。

③ 参见《这件事,十九大后习近平多次提及》。

④ 《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第1版。

⑤ 参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30日,第1版。

⑥ 参见《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人民日报》2018年3月9日,第1版。

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关键在于通过科技创新推动农业转型，从数量驱动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同时，深入实施藏粮于地战略，严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全面落实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大规模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农田建设，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建设的重点是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档升级，让要素流动起来；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乡村美变成生产力；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建立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服务，吸引各类要素人才流向乡村。

农业农村现代经营体系是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要加强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中“统”的方面，充分发挥组织起来的农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体地位作用。关键在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壮大集体经济。习近平指出，“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是继家庭承包制后农村改革的又一大制度创新，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自我完善。要围绕正确处理农民和土地关系这一改革主线，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sup>①</sup>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让农业现代化成果惠及农村居民。要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激励各种要素到乡村大展宏图。创新乡村治理体系，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使农民真正成为农村生产生活的主人。

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以建立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为着力点，加快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统筹谋划制度创新的主体是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这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体系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健全党委统一领导、政府负责、党委农村工作部门统筹协调的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建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领导责任制，实行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党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深化村民自治实践。<sup>②</sup>为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在干部配备上优先考虑，在要素配置上优先满足，在资金投入上优先保障，在公共服务上优先安排。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预见的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国家，总体布局全面统筹实现城乡融合的历史进程，150年之后终于在神州大地呈现一派“马跃前程逐梦飞”的壮丽景象，从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乡村振兴战略“面面俱到”地回答和实践着恩格斯“留给他人去做”的历史遗愿。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践路径是上述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自觉性与客观条件必

<sup>①</sup> 《强化基础注重集成完善机制严格督察 按照时间表路线图推进改革》，《人民日报》2016年8月31日，第1版。

<sup>②</sup> 参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30日，第1版。

要性的具体统一，表现为目标任务实施步骤的合理性和可行性。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实施这些任务要坚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sup>①</sup>

### 三、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是一个长期过程，具有复杂性和阶段性。它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核心，激活主体、要素和市场，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其一，实现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激发行主体的发展愿望。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通过扶智扶志唤醒增强农户的发展信心，认识到依靠自身能力的提高也能发家致富，为乡村振兴奠定内因动力。抛弃“农村等同于农业，农村就是提供粮食和劳动力的地方”，“农业农村是贫困人口和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等错误观念，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发展理念，以新思路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其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深化农村改革。习近平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本靠深化改革。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要抓紧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真正让农民吃上‘定心丸。’“着力推进农村集体资产确权到户和股份合作制改革，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sup>②</sup>“现在，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农民家庭越来越多，土地承包权主体同经营权主体发生分离，这是我国农业生产关系变化的新趋势。这个变化对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不断探索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sup>③</sup>“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个大事，涉及的主体、包含的利益关系十分复杂，必须审慎稳妥推进。不管怎么改，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产量改下去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sup>④</sup>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

① 参见《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7年12月30日，第1版。

② 《加大推进新形势下农村改革力度 促进农业基础稳固农民安居乐业》，《人民日报》2016年4月29日，第1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7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第177页。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资格认定和成员权界定为核心，巩固完善农村山水林田湖草产权制度，推动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因地制宜制定进城落户农民“三权退出”办法。要遵照习近平的要求构筑农业农村人才体系。“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选好配强党组织带头人，发挥好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为乡村振兴提供组织保证。”<sup>①</sup>

其三，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建立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乡村成为城市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流入地，乡村才能成为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要建立健全安全、有序的土地经营权流转交易市场，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积极探索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以及面向城市居民的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有序消除城乡劳动力流动的落户限制，完善户籍及配套福利制度，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深化城乡金融体制改革，推进农村金融创新，探索农村财产抵押贷款政策，打通城市资金进入农村的各种流动障碍。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激励农业科技成果在农村落地。

其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创新产业形态业态，以科技支撑产业发展质量，以组织提升产业融合程度。要深入推进质量兴农战略，推进农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调整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大力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创新运用“文化+”、“互联网+”、“生态+”等思路，促进农业观光、乡村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发展。充分发挥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的产业联合带动作用，发挥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农业科技园的集聚和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积极培育特色小镇、文旅小镇、田园综合体，带动乡村产业快速发展。

其五，实现乡村振兴战略需要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使乡村成为城乡居民向往的生态宜居之地。要高度重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推动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以市县为单位，推动优质学校辐射农村薄弱学校的常态化。统筹配置向乡村倾斜的城乡师资，建好建强乡村教师队伍。要加快农村路水气网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村物流网和信息化建设，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要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大病保险制度，做好农民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巩固城乡居民医保全国异地就医联网直接结算。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确定和基础养老金标准的正常调整机制。统筹城乡社会救助体系，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好农村社会救助兜底工作。强化农村公共卫生服务。

〔责任编辑：许健康〕

<sup>①</sup> 《这件事，十九大后习近平多次提及》。

## 建设生态文明 推进绿色发展

高世楫 李佐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sup>①</sup>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中国遵循新发展理念、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为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國思想。

### 一、鲜明的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世界性和时代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sup>②</sup>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sup>③</sup> 这是中共建党 97 年来的不懈追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全部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目的是提高人民福祉，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习近平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对人的生存来说，金山银山固然重要，但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是金钱不能代替的。你挣到了钱，但空气、饮用水都不合格，哪有什么幸福可言。”<sup>④</sup>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

①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20 日，第 1 版。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30 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 年 10 月 18 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 4 页。

础”，“绿水青山不仅是金山银山，也是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保障”，“群众天天生活在环境之中，对生态环境问题采取掩耳盗铃的办法是行不通的”。<sup>①</sup>“如果经济发展了，但生态破坏了、环境恶化了，大家整天生活在雾霾中，吃不到安全的食品，喝不到洁净的水，呼吸不到新鲜的空气，居住不到宜居的环境，那样的小康、那样的现代化不是人民希望的。”<sup>②</sup>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总书记这些朴实的语言表达，丰富了现阶段我国民生福祉的内容，深刻诠释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在中国人均 GDP 水平超过 9000 美元、恩格尔系数（基本生活必需品支出比重）不断下降的同时，人民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自 2011 年以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全国 31 个省份，开展了大样本民生满意度电话调查和入户访谈。调查数据显示，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度在所有民生关注度中位居前列。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污染防治力度取得实效，人民群众对环境质量改善速度比较满意，但环境质量问题仍然是最不满意的“社会病症”之一。<sup>③</sup>党中央顺应人民意愿，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把生态环境保护列为优先事项处理，通过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等一系列行动计划，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以回应人民最紧迫的民生关切。

鲜明的人民性，还体现在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要动员全民参与、形成全面共治格局的系列论述中。遵循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民性，就是要动员全体人民共同参与，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人人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做起，方能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方能持之以恒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局面。习近平针对时弊，大力倡导“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勤俭节约的消费观”，“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同时奢侈浪费之风也开始起来了，特别是‘土豪式的生活方式，纵欲而无节制。有的人觉得住上大别墅、开上豪华车，一掷千金，醉生梦死，人生价值就实现了。看看越来越多的大排量高档汽车，越来越多的高档饭店、豪华会馆、洗浴中心，越来越多的大吃大喝、杯盘狼藉，看看一些地方热衷于建设的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大剧院、大灯光等，要用多少能源呀！对这种奢侈炫耀、浪费无度的消费行为要进行制约。唐代诗人白居易说过：‘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以有时有限奉无极之欲，而法制不生其间，则必物暴殄而财乏用矣。’”<sup>④</sup>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这是对人民负责，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负责，也是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负责。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90 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36 页。

③ 参见王海芹、王超然：《环境保护专题研究报告》，《中国民生指数报告 2017》，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 年，第 185—196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117—118 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充分完整的科学性,体现了辩证法,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发展生产力必须尊重自然规律,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习近平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高度,强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他指出,“纵观世界发展史,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sup>①</sup>“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sup>②</sup>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sup>③</sup>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数量居世界首位的发展中大国,习近平强调,必须“坚持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这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思想。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从改变自然、征服自然转向调整人的行为、纠正人的错误行为。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爷”。<sup>④</sup>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财富既体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作为交换价值一般等价物的货币,为人民谋幸福,就必须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正确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当二者有冲突时,要将全社会的长期效益置于企业和个人的短期经济收益之上。习近平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如同保护人类的眼睛和生命,远比赚钱重要,“那种要钱不要命的发展,那种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发展,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sup>⑤</sup>“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就是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否则,即使“挣到了钱”,“哪有什么幸福可言”。<sup>⑥</sup>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体现在对大自然物质循环规律的把握,对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安危休戚关系的揭示。2013年,习近平运用系统思维创造性地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6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50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24页。

⑤ 《40多年来,习近平始终对这件事很上心!》,2018年5月18日, [http://news.youth.cn/sz/201805/t20180518\\_11623948.htm](http://news.youth.cn/sz/201805/t20180518_11623948.htm), 2018年6月2日。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8、35—36、62、4页。

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必须“对山水林田湖进行统一保护、统一修复”；<sup>①</sup> 2017年，他又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sup>②</sup>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遵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其内在规律，科学地“揭示了自然要素之间、自然要素和社会要素之间通过物质变换构成的生态系统的性质和面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化自然观、系统自然观和生态自然观”，<sup>③</sup> 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传统智慧，也与现代生态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尤其是经济学对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分析的最新成果具有一致性。<sup>④</sup>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还体现在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上。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无数事实证明，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和科技进步，解决环境问题，建设生态文明，同样离不开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品创新。这就要求我们“依靠科技创新破解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sup>⑤</sup>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性，更体现在对绿色发展中经济规律基础性作用的尊重和对美欧国家发展老路的反省上。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sup>⑥</sup> 生态环境治理必须系统治理、整体治理，从源头严防、过程严管，不能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老路。“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欠账太多了”，“很多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把生态环境破坏了，搞起一堆东西，最后一看都是一些破坏性的东西。再补回去，成本比当初创造的财富还要多。特别是有些地方，像重金属污染区，水被污染了，土壤被污染了，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走美欧老路是走不通的，再有几个地球也不够中国人消耗。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sup>⑦</sup>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47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第24页。

③ 参见张云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2018年5月22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eory/2018-05/22/content\\_51477452.htm](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eory/2018-05/22/content_51477452.htm)，2018年6月10日。

④ 参见 Fritjof Capra and Pier Luigi Luisi, *The Systems View of Life: A Unifying Vi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Kenneth J. Arrow, Paul R. Ehrlich and Simon A. Levin, “Some Perspectives on Linked Ecosystems and Socioeconomic Systems,” in Scott Barrett, Karl-Göran Mäler and Eric S. Maskin, eds.,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 Econom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95-116.

⑤ 习近平：《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奋斗——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30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25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3—4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植根于中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社会实践，致力于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发展。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重视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层群众在大量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的一些创新性做法。<sup>①</sup>习近平在福建、浙江等地主政一方时，都强调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扎实推进绿色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这是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理念的实践之源，铸就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性品格。<sup>②</sup>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把环境保护协同作为三大协同战略之一；长江经济带发展强调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突出绿色发展。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2018年新组建了国家自然资源部和生态环境部，并加快推动省以下环境监测监察垂直管理改革试点。这些实践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改造世界、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sup>③</sup>相比之下，西方主流经济学或非主流的左翼经济学等流派的分析，或治标不治本掩盖制度影响的危害，或带有浓厚的经院哲学、生态乌托邦色彩，视其理念为“后现代追求”，都不重视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可行性。<sup>④</sup>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世界性。中国在推进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不走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在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逆境中力挽狂澜，冲破重重阻力，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活动导致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地球大气温度上升。世界各国开始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全球治理的紧迫任务。中国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并以一个发展中大国负责任的担当，实质性地推动了巴黎气候大会决议的形成，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在2013年2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27次理事会上，中国生态文明理念被正式写入决议。2016年5月，中国环境保护部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共同发布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① 参见李晓西编著：《绿色选择：中国环保体制改革与绿色发展40年》，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17年。

② 参见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第186—201页。

③ 《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83页。

④ 参见《国外理论动态》编辑部组编：《当代资本主义生态理论与绿色发展战略》，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赫尔曼·E.达利、小约翰·B.柯布：《21世纪生态经济学》，王俊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谢富胜、程瀚、李安：《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山：中国生态文明战略与行动》报告。中国还推动把生态文明和绿色金融纳入 2016 年 G20 首脑峰会共同声明。2018 年 5 月，国际能源署等多家国际机构联合发布《追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七：能源进展情况报告》，肯定中国对全球能耗降低作出了最大贡献，贡献率超过 35%，高于美国的 13% 和印度的 8%。报告还肯定了中国在清洁能源、电力普及以及改善人民生活上取得的巨大成就。<sup>①</sup>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引领下的中国，正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推动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新世界，构建新历史纪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来自中国灿烂文明的传统智慧，更反映了人类进入工业化、信息化时代，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最新要求，具备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满足人类对衣食住行高水平需求的基础上，实现与自然新的和谐相处，确保生态环境能够支撑人类永恒的生存繁衍。过去半个世纪席卷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冷战结束后全球追求和平发展的历程，使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成为与减少和消除贫困同样急迫的主题。<sup>②</sup> 发展，仍然是人类追求现代化的基本途径；绿色发展，则成为实现现代化和建设生态文明最基本的逻辑。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科学地回答了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之争中提出的时代难题，以明确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划清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绿色资本主义的界限”。<sup>③</sup> 他指出，“实现可持续发展，要有新的全球视野。老路走不通，创新是出路。”<sup>④</sup> “我们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人类可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但归根结底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呵护自然，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我们要解决好工业文明带来的矛盾，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目标，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sup>⑤</sup> “坚持绿色低碳，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与自然共生共存，伤害自然最终将伤及人类。空气、水、土壤、蓝天等自然资源用之不觉、失之难续。工业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我们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应该遵循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理念，

① Tracking SDG7: *The Energy Progress Report 2018*, May 2, 2018, <https://www.esmap.org/trackingsdg7-progress-report>, 2018 年 6 月 2 日。

② “21 世纪两个最决定性的挑战是减少贫困和应对气候变化，其中一个失败，另外一个也会失败”，“可以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承担气候变化责任结合起来，实现增长、发展、减缓和适应的一体化”。参见尼古拉斯·斯特恩：《尚待何时？应对气候变化的逻辑、紧迫性和前景》，齐晔译，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79—80 页。

③ 参见张云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141 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131 页。

寻求永续发展之路。”<sup>①</sup>

## 二、中国绿色发展的先进理念、制度保障和治理体系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集中体现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财富观和价值观，将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的多重社会价值与人类财富形式、大众福祉联系在一起，指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方向。良好生态环境最直接的经济价值，直观地体现在旅游业、绿色农业、森林业等产业带来的经济收益，其交换价值可用货币直接度量。但更重要的是，良好生态环境有巨大的社会价值，因为人民群众享受了绿水青山、白云蓝天、饮食安全等良好生态环境，带来身体健康、情绪愉悦等，从而提高了个人福利水平，并增进了全社会福祉。绿水青山在市场经济劳动二重性及商品二重性的辩证关系中，以其社会使用价值作为“最公平的公共产品”胜出，被工业文明异化的人化自然，<sup>②</sup>通过绿色发展实践的洗礼和扬弃，重塑为金山银山般最宝贵的社会财富。习近平关于生态环境的新价值观，影响着人类看待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的方式，也影响着人类理解和度量国民财富的方式。

为了更好地理解良好生态环境的价值、寻找可持续发展的实现途径，国际组织和学者一直试图寻求更全面反映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价值的度量方法。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一些学者，提出了许多关于人类财富范围和计量的方式。其中的综合财富（comprehensive wealth）论包括自然资本、人力资本以及可再生产的物质资本，并且对自然资本的度量方式也在不断调整。<sup>③</sup>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与技术发展水平、人类价值偏好、生产结构和消费模式有关，也与人类与生态环境的交互方式变化有关。通过提高资源效率、养成节俭的消费习惯、控制污染物排放、实施资源循环利用、注重生态修复，可以提高一个地区的生态环境容量，即提高生态系统的韧性（ecosystem resilience）。<sup>④</sup>人类的发展就是管理和优化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143—144页。

② 关于与“自在自然”对立的“人化自然”，马克思写道：“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9页）参见邓喜道、文九：《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当代价值》，《学术研究》2009年第11期。

③ 参见 World Bank, *Expanding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1997; Kirk Hamilton and Cameron Hepburn, eds., *National Wealth: What Is Missing, Why It Matter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④ 生态系统的韧性，是指系统受到扰动而偏离稳定状态后能够回到稳态。经济系统可持续性体现为其支撑的生态系统具有韧性。参见 Kenneth J. Arrow et al., “Economic Growth,

这些财富组合的过程；人类的永续发展就是随着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人均综合财富可以实现持续增长的发展或能力。为此，人们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所获得的租金用于再投资，以扩大人力资本和可再生物质资本生产，并在计算自然资本价值时，充分考虑生产活动对环境的损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约瑟夫·阿罗等经过计算表明，中国持续投资于人力资本和可替代的物质资本，同时将环境损害控制在一定程度（发展不超过环境容量），完全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即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保持人均综合财富的不断增加。<sup>①</sup>对生态环境价值的度量，有助于我们在宏观上判定一个国家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在微观层面，计算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价值，或者计算生态资本的存量和变化，有助于对生态环境服务价值或生态产品价格进行判断，以便通过直接交易或第三方补偿的方式，为生态产品或生态服务支付赔偿或提供补偿。人化自然须臾离不开人类一般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实践。“自然生态是有价值的，保护自然就是增值自然价值和自然资本的过程，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就应得到合理回报和经济补偿。”<sup>②</sup>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指出，“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使之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导向和约束。我看，我们一定要彻底转变观念，就是再也不能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一定要把生态环境放在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的突出位置。如果生态环境指标很差，一个地方一个部门的表面成绩再好看也不行，不说一票否决，但这一票一定要占很大的权重。”<sup>③</sup>“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sup>④</sup>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 *Science*, vol. 268, 1995, pp. 520-521.

- ① Kenneth J. Arrow et al., “Economic Growth, Carrying Capacity, and the Environment,”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vol. 6, no. 1, 1996, pp. 13-15; Kenneth J. Arrow et al., “China, the US, and Sustainability: Perspectives Based on Comprehensive Wealth,” in G. Heal, ed., *Is Economic Growth Sustainabl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p. 92-144. 阿罗等在计算污染或环境成本时，重点考虑了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地球升温，对不同地区带来的不同影响。
-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2015年9月21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9/21/content\\_2936327.htm](http://www.gov.cn/guowuyuan/2015-09/21/content_2936327.htm)，2018年6月2日。
-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99—100页。
-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91—92页。

“如果仍是粗放发展，即使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一番的目标，那污染又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届时资源环境恐怕完全承载不了。想一想，在现有基础上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总量增加一倍，产能继续过剩，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态环境？经济上去了，老百姓的幸福感大打折扣，甚至强烈的不满情绪上来了，那是什么形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倡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仅仅作为经济问题。这里面有很大的政治。”<sup>①</sup> 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发扬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习近平在对唯 GDP 英雄论的批判中形成的新自然资源价值观和新财富观，一定会带领中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老路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创新之路。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出发，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尤其注重绿色发展的制度保障和对环境污染的综合治理。习近平指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已进入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也到了有条件有能力解决生态环境突出问题的窗口期。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跨越一些常规性和非常规性关口。我们必须咬紧牙关，爬过这个坡，迈过这道坎”。<sup>②</sup> 生态环境严重污染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生态环境部主要领导分析说，“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发达国家一两百年出现的环境问题，在我国 30 多年来的快速发展中集中显现，呈现明显的结构型、压缩型、复合型特点，老的环境问题尚未解决，新的环境问题接踵而至。”因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必须突破常规战法，集中优势兵力，以重点突破带动总体推进”。<sup>③</sup>

习近平非常重视制度建设在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保障作用，强调要以此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生态红线的观念一定要牢固树立起来。我们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非采取最严厉的措施不可”，“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sup>④</sup> 正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先后在 2015 年和 2018 年颁布，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四梁八柱”得以建立，从源头到末端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得以实施，绿色发展有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确立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原则：“坚持正确改革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5 页。

②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20 日，第 1 版。

③ 李干杰：《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人民日报》2018 年 6 月 22 日，第 14 版。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99 页。

方向，健全市场机制，更好发挥政府的主导和监管作用，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和自我约束作用，发挥社会组织和公众的参与和监督作用。”<sup>①</sup> 这一原则不同于经济建设领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主导和监管作用，凸显了中国走创新之路的重要特征。要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完善资源环境价格机制”，<sup>②</sup> “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sup>③</sup>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确立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目标。“到 2020 年，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等八项制度构成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sup>④</sup> 八项制度的构建都是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重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自然生态监管体制改革。中国自然资源所有权只有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形式，但所有权派生出的产权形式和保障方式复杂多样。无论是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分级代理，还是集体产权的承包确权，都需要随着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不断推进而调整。正在进行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管理制度和自然生态监管改革，将为更高效地配置自然资源、更有力地保护生态环境，提供基础性的制度支持。鉴于中国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的独特形式，加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以及民主的政治协商方式，中国可以比许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更有效地解决“公地悲剧”<sup>⑤</sup> 问题。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市场与政府的两分法，走出了两分法带来的两难困境，<sup>⑥</sup> 提出实行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现行以块为主、多有弊端的地方环保管理制度，强调中央政府在治理严重环境污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采取战略性“硬措施”。即国家对资源消耗实施“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习近平强调，“要实施总量和强度双控，作为约束性指标，建立目标责任制，合理分解落实。要研究建立双控的市场化机制，建立预算管理制度、有偿使用和交

①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②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20 日，第 1 版。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 100 页。

④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⑤ 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即为“公地悲剧”。参见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vol. 162, no. 3859, 1968, pp. 1243-1248.

⑥ 参见 Cameron Hepburn, “Environmental Policy,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vol. 26, no. 2, 2010, pp. 117-136.

易制度，更多用市场手段实现双控目标。”<sup>①</sup>自2016年1月起，中央环保督察组对环境问题突出的省份进行督查以及“回头看”，对地方政府的震慑效果明显。正是因为我们较好地处理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我国重大生态环境保护工程的规划、实施和建设的效率，远高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全球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我国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将越来越充分地体现出来。

习近平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主体功能区战略，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途径”，“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党的领导，重视顶层设计。<sup>②</sup>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党在推进绿色发展中的领导作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推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实生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正指导中国绿色发展伟大实践蹄疾步稳地向前发展。从“生态文明”入宪法，到健全法律法规、强化执法司法，中国正加快推进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把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监督结合起来。这与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是一致的。习近平强调，必须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问责机制。中央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了中央环保督察制度，以形成有效的制度执行机制。<sup>③</sup>从政治学和行政管理角度看，这种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是中国制度体系的显著特点。<sup>④</sup>国家又积极动员全民参与生态文明建设，鼓励人民群众对企业排污、环保机构执法等进行监督。地方防治污染、保护环境的很多创新做法，得到中央的及时鼓励和推广。<sup>⑤</sup>注重顶层设计、鼓励地方首创、动员全民参与，形成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大合力，在生态环境领域体现中国制度的独特优势，正凝聚为治理严重环境污染的有效综合体系。习近平高瞻远瞩地从五个方面概述了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的内容，以及在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基础上，打好持久战的发展阶段性。“要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62、63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第43、44、51页。

③ 参见陈健鹏、高世楫、李佐军：《“十三五”时期中国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形势、目标与若干建议》，《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6年第11期。

④ 参见 Mark Beeson, “Environmental Authoritarianism and China,” in Teena Gabrielson et al.,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520-532.

⑤ 参见沈坤荣、金刚：《中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的政策效应——基于“河长制”演进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

安全体系。要通过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确保到 2035 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全面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实现，建成美丽中国。”<sup>①</sup>

### 三、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污染问题的根本之策。重点是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布局，调整区域流域产业布局，培育壮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sup>②</sup> 绿色发展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高质量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绿色发展体系的建构，就没有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绿色发展应当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普遍形态。

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下，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绿色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整体包括“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体制”，“以上几个体系是统一整体，要一体建设、一体推进”。<sup>③</sup> 习近平概括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七个层面中的绿色发展体系，就是上述生态文明思想在经济建设领域中的体现。七个层面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党对经济工作和生态文明的领导，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进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实现效率变革、质量变革和动力变革，

- 
- ①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20 日，第 1 版。
- ②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 年 5 月 20 日，第 1 版。
- ③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 年 2 月 1 日，第 1 版。

必须按照绿色发展理念,提高资源效率、保护生态环境,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

从全球视角看,在可持续发展、绿色增长、<sup>①</sup>绿色经济、<sup>②</sup>包容性绿色增长等不同话语下,绿色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范式变革的重要内容,是当前世界发展理论创新的重要方向。<sup>③</sup>这些理论和政策框架尽管在内涵、主要内容、评价体系等方面不尽相同,然而其落脚点都是在寻找通向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绿色发展道路。习近平说:“我们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要借鉴发达国家有益做法,更要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sup>④</sup>

加快推进我国的绿色发展,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针对存在的制度障碍,按照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加快落实《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对生态环境领域改革进展进行系统评估,辨识改革中存在的问题,创造更加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sup>⑤</sup>一是加快建立健全支撑绿色发展的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新体制、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交易制度。二是积极推进支撑绿色发展的能源经济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石油天然气、电力领域等关键领域改革,建立健全反映真实成本的能源市场价格机制,建设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能源管理体制,建立保障公平竞争与能源安全的能源监管体制,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安全高效现代能源体系。三是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重点突破环境监管垂直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按照现代市场经济中监管体系现代化的原则,建立公开、透明、专业、高效、可问责的现代监管体系,完善中央和地方两级监管的生态环境监管体系。四是完善绿色发展考核的总体框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绩效评价及问责机制的制度化。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在实施中完善绿色发展考核内容,建立完整、系统、规范的绿色发展考核流程,强化绿色发展考核的结果应用。五是强化绿色发展的法治保障。加快绿色发展重点领域的立法工作,制定和完善自然资源法、环境法、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的能源法等上位法及相关法律法规,深化环境司法体制改革,加快提升绿色发展的执法能力。

制度和政策能够提供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的持久动力。除了加快推进

① OECD, *Towards Green Growth*,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1.

② UNEP, *Towards a Green Economy: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2011, [www.unep.org/greeneconomy](http://www.unep.org/greeneconomy), 2017年5月6日。

③ OECD, *Putting Green Growth at the Heart of Development: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3; OECD, *Towards Green Growth: Tracking Progress*, Paris: OECD Publishing, 2015.

④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2018年2月1日,第1版。

⑤ 参见高世楫、李佐军等:《用制度创新促进绿色发展》,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

制度建设，我们还需要制定一系列配套的经济政策，建立完整的政策体系，支持企业迅速获得参与绿色发展的技术能力，提高政府推动绿色发展的管理能力和有效监管能力，提升公众建设生态文明的参与意愿与参与能力。这对发展中国家走向绿色发展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建立绿色产业化和产业绿色化的绿色生产体系，是实现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的核心。为此，需要加快推进资源环境领域的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需要建立支撑绿色发展的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尤其需要在政府主导下制定和实施有效的产业政策，<sup>①</sup> 并注意与其他相关政策的有效协同。<sup>②</sup> 在绿色发展成为全球大趋势的今天，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目前都有相应的绿色产业政策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促进能源向清洁低碳转型，推动经济社会转型。<sup>③</sup> 中国成功实施绿色产业政策的实践，将改善占世界人口近 19% 的中国人民福祉，并产生巨大的技术外溢，为全球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许建康〕

- 
- ① 参见 M. Cimoli, G. Dosi and J. E. Stiglitz, *Industrial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abilities Accumul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1-18; Ha-Joon Chang,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London: Anthem, 2002; Robert H. Wade, “The Paradox of US Industrial Policy: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n Disguise,” in José M. Salazar-Xirinachs, Irmgard Nübler and Richard Kozul-Wright, eds., *Transforming Economies: Making Industrial Policy Work for Growth, Jobs and Development*, Geneva: ILO, 2014, pp. 379-400.
- ② 斯蒂格利茨认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往往最适合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和要素结构，发展中国家难以直接应用。发展中国家必须通过“干中学”建立自己的学习能力，将发达国家的技术进行适应性改造，或开发出最适合本国要素水平和能力水平的技术。参见 Joseph E. Stiglitz, “Learning to Learn, Localized Learning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n P. Dasgupta and P. Stoneman, eds., *Economic Policy and Technological Performan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25-153; Joseph E. Stiglitz and Bruce Greenwald, *Creating a Learning Society: A New Approach to Growth,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 ③ 参见高世楫、李佐军等：《用制度创新促进绿色发展》，第 334—364 页；T. Altenburg and C. Assmann, eds., *Green Industrial Policy: Concept, Policies, Country Experiences*, Geneva, Bonn: UN Environment; 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 / Deutsches Institut für Entwicklungspolitik (DIE), 2017.

**ABSTRACTS**

**(1) The Conversation in Writing on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Hong Yinxing, Liu Wei, Gao Peiyong, Jin Bei, Yan Kun, Gao Shiji, and Li Zuojun • 4 •*

Since the 18<sup>th</sup>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has made historic progress and Xi Jinping’s Economic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hich takes new developmental thinking as its main content, has developed through practice. Thi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also the newest fruit of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Journal is organizing six article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n their study of the economic thinking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for a New Era. Professor Hong Yinxing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points out tha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start from the basic standpoints and epochal characteristics in developing the theory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should be laid down in terms of the three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operation. Professor Liu Wei fro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xpound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s new developmental thinking in terms of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logic. CASS researcher Gao Peiyong summarizes the far-reaching changes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and control over the last five plus years in terms of the five areas of analytical perspective, developmental thinking, main policy lin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s and the role of government. He holds that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 economic thought, a preliminary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and control for the new era. To gain a better grasp of the demands of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economy put forward by Xi Jinping, Jin Bei, CASS

• 204 •

researcher and Dean of the Business Schoo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explores the new thinking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from five perspectives: economic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dynamics; the relationship of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nd value goals; economic entities and their requirements; methodological structure and accuracy; and the strategic rules of new developmental thinking. CASS researcher Yan Kun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and epochal significance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analyses the main innov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 of the new thinking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searchers Gao Shiji and Li Zuojun, both from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Institute of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discuss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Xi Jinp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its epochal natur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and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We hope to advance the scholarly principles of the innovative theory of the CPC by summarizing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continuous deepening of the historic changes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2) The Big Data/Social Computing Methodological Revolution in Public Management Studies**

*Fan Ruguo* • 74 •

Modern society is an intricate system of great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The complexity of public issues and extensive “governance failure” indicate that public management studies need to turn from the thinking of an industrial society to that of an information society, to carry out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on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to adopt the thinking of big data and social comput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complex public management. Big data analysis and social computing enable us to accurately identify and depict new problems in public management, effectively reducing its complexity and uncertainty; to gain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laws governing complex public issues; and to improve public management’s predictive and decision-making ability, optimize public service, and make public management more scientific, smart and accurate. This represents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is also a profound reform in public management thinking and behavioral modes. Big data research requires the presence of the mental world, but may also encounter the problem of “symmetry breaking.”

• 205 •